



## 中评周刊 | 第 74 期目录

### 专题 | 人工智能与道德风险

1. 盛洪: 讨论一下人工智能的负面影响 P. 2
2. 吕兆楠: 人工智能与管理 P. 4
3. 宁越: AI 时代计划经济大数据仍然不可计算 P. 6
4. 何光沪: 建立国际监管, 预防人类浩劫 [人工智能问题系列思考之二] P. 14
5. 王焱: 透过计算, 支配世界 P. 19
6. 盛洪: 生产能力和道德能力 P. 25
7. 蒋豪: 人工智能爱与忧 P. 31
8. 讨论与提问「人工智能与道德风险」云豹沙龙 P. 33

### 观点文章

1. 蒋豪: P2P 接连爆雷, 监管为何缺位? P. 46
2. 张林: 如何量化中国互联网管制的冲击? P. 50
3. 盛洪: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市场 P. 54

### 随笔散记

- 金雁: 每个民族都要正视自己的痼疾 P. 62

### 读书

- 张维迎: 后发国家的怨恨情结 P. 69

### 预告

- 云豹沙龙 | 2018-2019 年度众筹 P. 77

- 订阅 | 往期下载 P. 79

## 盛洪：讨论一下人工智能的负面影响——在「人工智能与道德风险」云豹沙龙的开场白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作者 2018 年 7 月 11 日在「人工智能与道德风险」云豹沙龙的开场白，转载请注明〕



非常感谢大家！昨天正好天则所发生了比较大的事，我们还是遭受了很大冲击，但是大家还在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来参加我们这个会。刚才蒋豪说要鼓掌，我就对这个鼓掌有点敏感了，为什么？因为这两天居委会的人来说我们扰民了，后来我们说我们两个礼拜开一次学术会，我们平常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会，我说你们如果觉得扰民我们开会就不鼓掌，所以在这儿鼓掌还是可以的。他们这扰民显然是强词夺理的。

关于人工智能，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其实不是一个新的题目，它其实已经被多次讨论，而且现在也特别热门，大家可以统计一下，有很多人工智能的讨论。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主要的讨论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技术讨论，就是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讨论，这些讨论我们可能都不见得懂，这种讨论非常多。还有一类叫做人工智能正面作用讨论，就是说可能这个时候像我们经济学家或者还有一些社会学家，这些人他们都讴歌人工智能，说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了福音，人工智能将来会解决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人说有了人工智能，我们人类还干什么？回答是，整天玩。这似乎有点像毛泽东那儿说，我们粮食太多吃不了怎么办那样的。其实还有一类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人工智能的道德伦理方面的维度，或者说它有一些负面的东西。这方面我们特别感谢何光沪教授，因为我们今年在新年期许

会上，大家讨论很多问题，但是大家比较集中于中国将来的发展，光沪提出来人工智能伦理方面的问题，大家听了耳目一新，说是啊，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思考。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题目如果我们不思考的话有很大问题，因为人工智能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人类科学技术的一个新的飞跃，而这个新的飞跃一定有他的正面作用、负面作用，因为一种技术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是中性的，有不同的用法。所以我们只看到一个东西好的方面、不看它坏的方面，肯定是不对的，不符合我们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光沪给我们的提醒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开这样一个会，我觉得这种会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并不多，我相信一定有，在西方可能多一些，在中国尤其少，所以我们开这个会，我相信我们这个会一定是非常有成果的。

同时，我们要感谢吕老师，我们云豹沙龙开了好几期，今年尤其是吕老师支持赞助我们开这个的会，没有吕老师支持我们也开不了这个会，非常感谢吕老师。

谢谢大家! 🍷

[【返回目录】](#)

## 吕兆楠：人工智能与管理

[吕兆楠 独立学者。本文为作者 2018 年 7 月 11 日在「人工智能与道德风险」云豹沙龙的演讲，转载请注明]

我对今天沙龙的题目很感兴趣。

天则是茅老带头，同盛老师、张老师等人创办的。所以说我对天则智库很爱护，同时我对天则的人（知名学者、教授）很钦佩，他们各自表达了不同的学术见解。因此，今年的沙龙会议是我省吃省用之后赞助的，而且今天这个题目也是我出的，我昨天晚上从上海过来，今天有几位大师在这里发言，也是我向他们学习的机会。

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问题，是不可逆转，要发展下去的。其实机械手早就产生，中国人的“筷子”就是延长的、原始的机械手。



特斯拉 CEO 马斯克 [Elon Musk] 在 2017 年 7 月 15 日美国全国州长协会夏季会议上公开表示“人类真的应该警惕人工智能”

我认为人工智能也是人类一大划时代的发明，对于人工智能或者称为智能机器，我感兴趣的倒不是它发展到什么程度，而是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是不是对我们人类一直有奉献的，这是我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有很多人都这么说，尤其是霍金在他逝世前就讲这个问题，地球和人类的毁灭，其中一种可能就是机器人要杀掉你。机器人其实是个计算机，或者是计算机的延伸，它的“大脑”发展到某个阶段比我们人类更发达，那时人类仍旧要“消费”，但机器人不需要“消费”，所以机器人认为人类是“多余人”，杀掉你，结果变成机器人世界了。假如这种说法是可能的话，人类肯定不会待毙的，那怎

么办呢？既要机器人代替人类“工作”又不被机器人杀掉人类，这是我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

我曾经对学生讲过管理学，管理学现在很成熟，名师辈出，流派各异，管理大师中的大师德鲁克曾得到美国总统的勋章，中国管理学界的“诺贝尔奖”——“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每年产生三名。

我想，现在管理学这套理论对机器人的管理上要重新改写，因为现在管理学是针对“管人”的，试问，用来管理机器人适用吗？显然回答是否定的，或者说，机器人还未认为人类是“多余人”之前，我们怎么去管理机器人，这是一道管理学“红线”，这方面的管理学研究几乎还是个空白，需要重新开始？

那么发展趋势是“机器人管人”的时代迟早会到来，我说这就是个风险。当然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不会的，毕竟机器人是我们人类发明的，他不可能今后将我们杀掉、将我们踢出地球。

我认为，不管是人类最终驯服机器人，或机器人最终听人类指挥，管理学本身要重新起草，对象不同了，我说风险就在这里。

人类原始社会就产生了“管理”，任何事情都要管理的，包括现在人类管理机器人，将来机器人管理人类（它的边界为“不杀人类”），若不考虑机器人管理人类的事情，让它一直发展下去，到一定的时候它不要我们了，这种风险是存在的。

我还是说，我们在管理学上对机器人管到什么程度，即管到机器人不可能杀掉我们那个地方为止，叫它不要发展了，可能否？我讲话可能太荒唐了，因此，风险的道理就在这里，风险有一道线，不要超过这道线，超过这道线要“杀”我们了，除非机器人的发展会表现出“伦理和道德”的思维，或者会“自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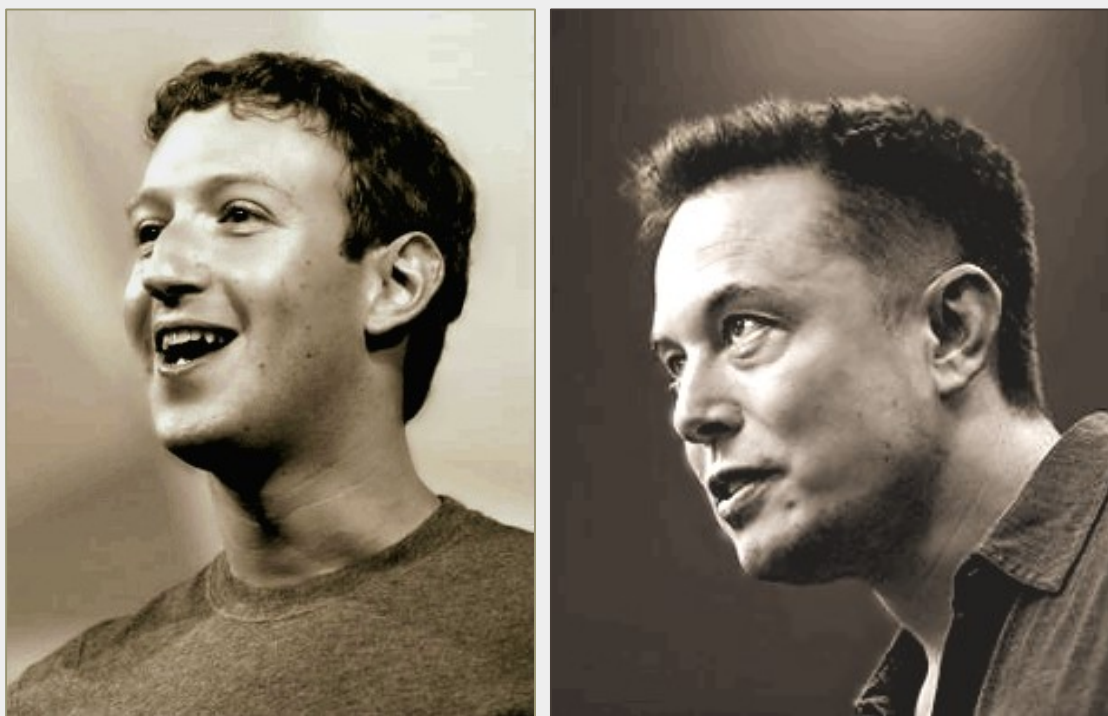
我就提出这么一些想法，请教大家。 🍷

[【返回目录】](#)

## 宁越：AI 时代计划经济大数据仍然不可计算

[宁越 经济学学者。本文为作者 2018-7-11 在「人工智能与道德风险」云豹沙龙的演讲，标题、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谢谢蒋豪，谢谢吕老师，人工智能一般的说法，专业性的发展比较快，专业性的机器人之类的，所谓一般性的人工智能，中文我不清楚，我是看英文的，一般性的人工智能发展比较慢，一般性指的就是跟人一样的思维，有行动、有情感、深度学习、快速的进化。但是这方面也有人预计，十年之内，一般性的所谓强智能的就出来了。像这种智库，无论社科院或者天则所，可能在从社会科学、从伦理、法律这方面早一点研究还是有必要的，现在研究不足，但是好像似是而非的也基本了解一些。



扎克伯格与马斯克在人工智能是否威胁人类的隔空论战中观点相左

比如说刚才讲到的马斯克跟扎克伯格两个不同的意见，马斯克说有风险的，可能主要就涉及到刚才讲到的机器人到高级阶段，他就可能杀人，低级阶段就像日本机器人杀人已经发生了。扎克伯格说没有风险，实际是错的。因为现在发生的事件已经证明人工智能出现风险，因为他的数据管理，他把数据给了英国的一个科学家，英国科学家能够利用比方 5 千个或者多少个数据，他能够用这 5 千人链接其他的用户，都能不断的找下去，这样的话他用的数据特别大，他甚至拿这套数据来影响美国的选举，而且确实好像这些数据也用在影响定向的发布广告。俄罗斯社交媒体也会这样去做的，定向的精准的发广告。

**何光沪：**俄罗斯上次选举已经影响了。

**宁越：**现在的影响是在偶然情况下，选出来的无论他有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选出来的川普恰恰是代表纯粹的真正的保守主义，因为你看它现在做的很多东西是支持基督教立国的，他是支持原法旨主义，美国宪法怎么写的，你在宪法实践中尽量用这个文本，并且探究当时这些立宪者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当时的民众是怎么理解的，从这个角度去挖掘我们的判断，而且川普他的运气好，他提名了大法官戈萨齐之后现在又提名第二个卡瓦诺，无论是戈萨齐还是现在新提名的，都是崇尚原法旨主义的，实际上就决定了如果这个提法通过以后，大法官里面 9 个人是真正的保守主义思想占上风，影响美国至少 30 年、35 年。但是他不仅仅影响美国，影响的是全球。这种理念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即使现在不到最高阶段，但并非永远不会有最高阶段，会不断地发展，人工智能还没到很高级的阶段实际上已经产生影响了，美国的生存方式影响了全球的生存方式，你反过来想，如果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人工智能发展得很厉害，而且现在也开始在用，比如说人脸识别，或者是现在你的手机跟我的手机靠得这么近，据说它能够监测出我们这几个人都在这里。还有视频，交通要道上有很多视频，到处是视频，英文叫 CCTV。

**何光沪：**监测器。

**宁越：**像民主国家或者台湾这样的小地方，他会预先告诉你这里有录像，要提醒你，我们中国是很少见的，基本上没有的。

**何光沪：**英国告诉你 CCTV，看到 CCTV 就注意一点。

**宁越：**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几个人脸一起过去他能够同时识别，很快。也就是说同样一个技术，它用在民主国家也可能会出错，也许当时希拉里脑子聪明一点也悄悄用这套技术，她就赢了。希拉里当时也用社交媒体，用的大媒体。

**何光沪：**那是他们自己弄的，不是川普弄的，是支持川普弄的。

**宁越：**但是川普自己弄也是合法的，川普最重要的顾问就是媒体的那个，叫什么新闻？

**何光沪：**福克斯。

**宁越：**福克斯是支持传统的，还有一个是报纸布拉特，德语就是“大胡子”（Breitbart）的意思，是班农的一家报纸，这是正宗的代表支持保守主义。他是支持川普，他当时参加川普又退出了，还说他儿子是叛徒，但现在据说又在支持川普。班农就是用这些社交媒体，为川普竞选立下汗马功劳。

**吕兆楠：**后来外交部长是不是班农？

**何光沪：**他退出来了，下来了。

**宁越：**这也意味着，美国人说川普他是属于民粹主义，不代表什么美国的精英阶层，川普自己就是精英，班农都是精英。现在用的这些人都是华尔街金融家和大商人，包括他想让比尔·盖茨作为最高的经济顾问，第一经济顾问，比尔·盖茨没答应。比尔·盖茨用在别的方面，为人类可能贡献更大。

我这个等于简括地引入一种思考，从哲学方面我们何老师在、思想方面、历史方面有王老师在这儿。

在信息利用上人工智能有这么一个特点，第一块，大数据，是人工智能的一部分。“大”，我们究

其定义而言，就是很多乱七八糟的数据不搭界放在一起就会得出一些结论来，正常反计量的，原来的计量就是我要几个因素，一套数据，这是气候，这是性别，这个是教育等等，都工作在哪些地方，有5年的工作经验等等，找到一组齐整的数据，理出自变量和因变量，通过建立计量模型计算出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大数据不用计量计算这些相关性。大数据就是把不同的因素堆到一起，通过云计算，那是并行式计算、分布式计算，它计算的量大，得出一些结论。比如说我跟盛老师我们去过成都，有一个商务大数据公司。可以展示某某国有企业，跟其他的某个人有什么关系，他把这个人的数据放入，把国有企业数据也放进来，一算，这个人跟国有企业的各种关联很清楚，他可能关系的密度用不同的因素表示。这样一个圆形一层一层的，这个公司第一层什么人、第二层什么人、第三层什么人都出来了，你这个民营企业家在国有企业是属于第几层，有关联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跟国有企业政府有合作或者有勾连，一看就看出来了。实际这种类似的图几年前我在《007》电影里就看到过，就是这样一个圆图，一层一层的。



Shutterstock / Willyam Bradberry

自1987年以来，仅日本已有十余名工人死于机器人手下、致残有7000多人，

此外，在英国、美国也发生过机器人杀人、误杀事件；

1989年，前苏联国际象棋冠军古德柯夫和机器人对弈连胜3局十分得意，宣称机器人智力斗不过人类，

此刻被触怒的机器人向金属棋盘释放了高强度电流，恰巧古德柯夫的手正怡然自得地放在棋盘上，

众目睽睽之下，一代国际象棋大师死于非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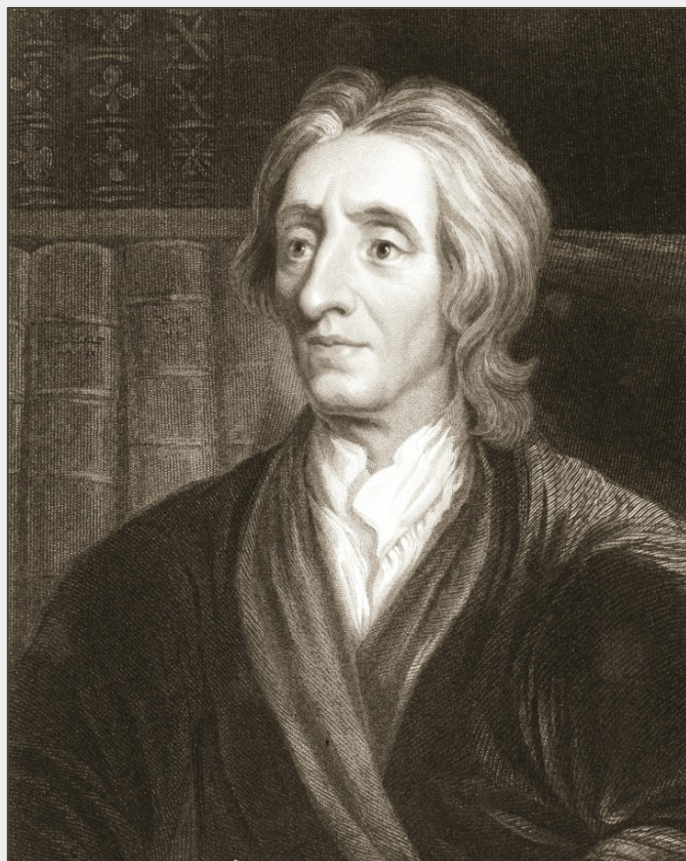
财新传媒跟北大搞了一个新经济发展的什么指数，他们说是用大数据算的，但实际上他们用的似乎都是计量，所以与大数据似乎没关系，他们找了一些数据就测算，区分哪几个新经济领域，哪个领域对新经济发展有多少贡献，他算的都是计量，但是我刚刚讲到了大数据是反计量的，计量就是相关的关系。

刚刚讲的，从信息利用上人工智能可能首先涉及到大数据的领域，第二块，常规数据的领域，它也

能用。人工智能虽然计量可能比人算得快。

第三个是数据信息系统，就是他把数据作为系统来分析，马克斯·韦伯就讲能够理性化，他在应用数据方面进一步理性化，背后就是所谓的学习机制，尤其现在讲高级阶段的人工智能能够深度学习，然后自我进化。除了信息之外，还有和信息有关的技术，高级阶段的人工智能也是可以深度学习，然后自我进化。这里涉及信息角度和技术角度。

机器人跟人工智能害人甚至杀人实际上已经发生，陈老师给我们的文章里有一篇讲的，会优先的用于军事，在中国和全世界基本上用在军事维稳方面，其实用在别的方面大家关注不会太大，但是在军事维稳方面大家关注的不对称程度不一样，并不是说在其他领域不用，但是我们会发现，尤其在中国这种威权国家，你会发现在我们航母上、在军机上、在战机上、在人脸识别上，到处是精密的、非常高清的摄像头越来越多，据说最初是美国人卖给我们的，在大陆生产的。现在国内自己生产了，最早的高清摄像头是美国人到中国来生产的。



**约翰·洛克** [John Locke 1632.8.29—1704.10.28] (铜板肖像, 牛津基督教堂 藏)

英国 17 世纪政治哲学家，与乔治·贝克莱、大卫·休谟三人被列为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主张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并且保障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时，

其统治才有正当性，他的传世警句

“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被无数次引用，

洛克的思想对于后世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还有行为识别，就是大家手机靠这么紧，据说很快就识别了这几个人在一起开会，甚至他都能听

到，这就是识别你在干什么。

再接下去就是涉及到，我跟盛老师都研究经济学，从经济学的角度它会做些什么？有了人工智能，能否导致计划经济，我们以前开过一次会，就是大数据是不是能导致计划经济。

**吕兆楠：**这是马云讲的嘛。

**宁越：**对，我们批评马云的一些观点，因为他是商界的领军人物，你不批评他的话，他的一些负面影响的观点会影响很多人。能不能依赖大数据或者人工智能搞好一个经济，而且通过计划经济方式，就是搞计划经济，如果利用大数据或者是人工智能，能不能搞好，搞得比市场经济还牛？

我的结论是，肯定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才有有关货币和市场价格的大数据或者人工智能大数据，计划经济下的大数据可以加强对人的控制，但是没有货币和市场价格的大数据或者人工智能大数据。计划经济在大数据时代仍然不可计算。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与约瑟夫·A·熊彼特

现在各国政府解决经济温饱问题事实上很容易。实际上经济最重要的并不是解决温饱问题，温饱问题谁都能来解决，只要你不发生战争。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个人主权，每个人都有主权，洛克讲的，人对自己有广义的产权，你的生命权、人身权、产权，加起来就是广义的产权，我自己拥有我自己狭义的财产权，刚刚讲到的生命权、人身权、财产权，那个财产权是狭义的产权。计划经济是把人作为一种工具，你是个螺丝钉，无论王老师的脑袋多大、多聪明，我就把你当螺丝钉，管你有什么学问我就让你洗碗、让那个人扫地，就是把人作为螺丝钉用的、把人作为工具。计划经济的不可计算性，奥派米塞斯跟哈耶克早就论证充分，可以说是人类当中的先知。20世纪20年代米塞斯与东欧的奥斯卡·兰格展开计划经济懒得论证，后来哈耶克加入到米塞斯的阵营，最后论证的结果，熊彼特说，米塞斯一派输

了。

但是熊彼特错了。因为米塞斯和哈耶克把观点都讲明了，也用再论证了。比如说我跟你用理由争论，我都讲明白我的理由，干嘛还要跟你持续争论？先头的理由适用于兰格后来提出的计划经济“可计算性”设想。实际上兰德他们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他们用的是新古典的框架分析，包括用计算机来解决计划经济的可计算问题。其实那时候整个学术界多数以左倾为时尚，认为“左”是解决人类问题的方向，因而认同种种形式的集体主义，但是到了后来 90 年代初，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崩溃，包括东德加盟到联邦德国，最后也是证明哈耶克是对的。但是米塞斯和哈耶克没有强调计划经济本来就是反人类的，扼杀每一个自由的个体、平等的个体。但是他们的论战是完美的，即使没有提升到基本权利保护的高度，从经济学上就分析得非常好。

其中有一个观点，如果你真正搞计划经济，货币仅是一个记账的符号，不是真正的货币，也没有基于真实货币的价格，计划经济没有市场，他也就没有市场价格，也不能对成本和收益做评估。所以你就不可计算，最后你也反映不出从经济学角度真正的稀缺性，你只能从数量上，比如说你用了多少钢材，用了这次钢材多少、那次钢材多少、还剩下多少、铁矿石可以用来生产这类钢材、那类钢材，但不是从经济学角度。

经济学实际在效率分析上是分档次的，比如技术效率，就是投入、产出，那不代表真正的经济效率。但是经济角度所讲的稀缺性，是用市场价格来衡量的，那个是真正的经济效率来衡量，稀缺性高了，价格就上去，那你就要去组织更多的原料、采挖更多的矿材，或者你发明新的能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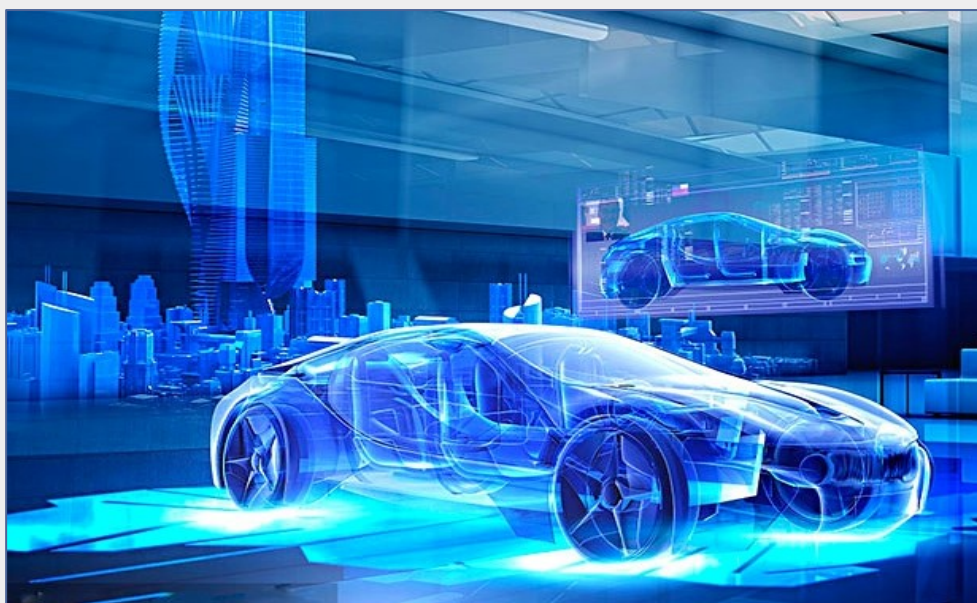
以前我们说的人工智能，和现在说的有一点不同的是，它也能参与创新，或部分创新，它也能做一些艺术，但是这跟它的发展阶段有关，越到高级的发展阶段它的创新越多，但是根本性的就是这种，它可能比以前通过计算机计算模拟价格上面，比以前做得好，比过去的计划经济派提出以计算机模拟价格会模拟好一点。但是在创新方面，可能因为人工智能是人的创新的产物，我个人觉得，你真正搞计划经济的话，他创新的动力和可能性上应该还不如人吧，比如说颠覆性的创新，比如说要想出数字货币这样的，原来一点都没有的，你要让人工智能去想出来，我觉得概率特别低、或者借用区块链分布式的来解决问题，本来就是与计划经济相对立的，在计划经济下很难想出来。人类很多新的可能性，通过人工智能来给你创新出来，可能还是概率比较小。

还有三个问题，涉及到经济领域，一个是人工智能能否造成失业？人工智能、机器人是否要被征税？比尔盖茨讲过，以后要对机器人征税，实际上他们高估了人工智能的价格，实际上以后人工智能就跟日本人现在已经在用的全息女朋友，全息的女朋友约合 15000 多人民币。

**吕兆楠：**什么叫全息？

**宁越：**全息指激光三维的一个图形跟你说话、跟你表演，实际上是空的，你可以穿过它，好像才 15000 多人民币，就是以后机器人穷人也是买得起的，至少用贷款可以买吧？并不是说你要做事情只有富人才能买得起机器人，借助机器人的力量更多、更快的创造价值，实际上穷人、富人都可以参与

的。在高人工智能低级、高级阶段都是一样的，跟我们现在结论是一样的，现在结论是增进人工智能这种资本品的发展，促进资本自由，对穷人、对富人都是有好处的，并不是说只对富人有好处的。如果你完全傻，你是脑残，你脑残当然本来就是别人养着的，在任何社会都是这样的，你脑子不能指挥自己的手、脑子不能指挥自己的四肢去做事情的话，就得别人养着你，只要你不是脑残，就可以做事情创造财富。如果说人工智能会造成失业，这种结论太简单，因为人工智能时代会创造很多新的行业，很多人会去做一些设计，而且人工智能帮你设计。



全息虚拟成像技术 [front-projected holographic display]

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全息摄影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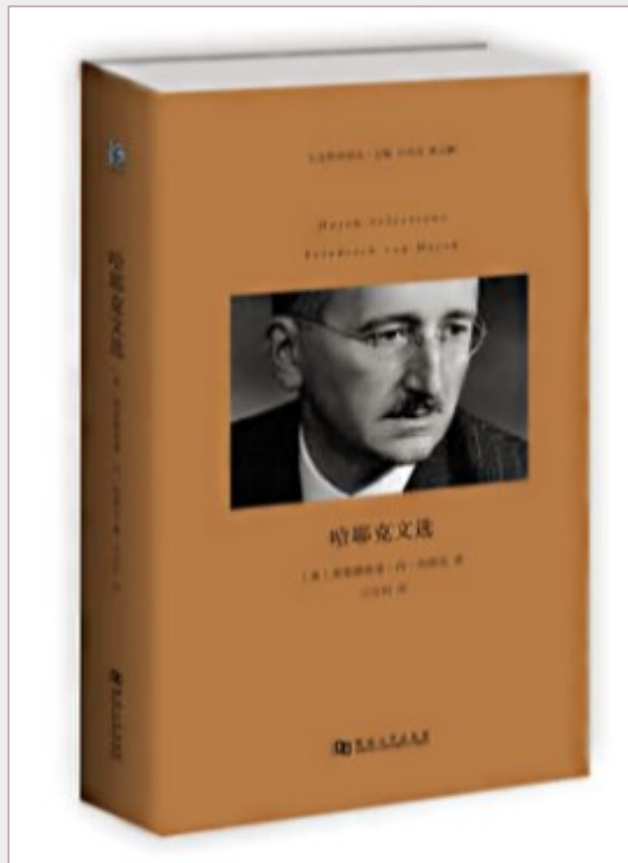
已广泛应用于科技、展馆、商业、影视、艺演舞美与环境等各种社会活动的展示手段

结论就是说，你不需要对机器人征税，你就是对人征税就行，我觉得单一税最好，比如说保加利亚就是单一税 (flat tax)，就是个人所得 10% 征税，就一个税率，无论你收入多高，何老师收入 10 万也好，100 万也好，就 10%，然后是“经营所得税”，他不叫企业所得税，跟你企业没关系，你只要是经营所得，就是 10%，这不很简单嘛。这样的话，简化嘛，单一税嘛，也叫“平税”，李稻葵讲是“平税”。

在陈老师提供的材料里讲到，有一个名家讲了一句话，意思是说，人工智能造成就业减少，实际上造成了有购买力的消费者数量不够。我刚才已经讲到就业不是他说的那样，消费购买力不足这个问题也不存在。

哈耶克在《哈耶克文选》这本书里讲到，反对凯恩斯的消费不足论，对于他来说，稍微有一点储蓄是为了投资，就是现在消费和以后消费的差异，我现在消费为了以后能多消费，所以他还是平衡的。凯恩斯的消费不足理论是错误的，包括米塞斯也是反对消费不足论。即使不用他们的理论，至少在购买力方面，不会因为人工智能的高级阶段化而变得购买力不足，这是大致的判断。

我的讲话就到这里，供大家批判。



《哈耶克文选》2015年版

[英]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著，冯克利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年4月出版

**吕兆楠：**你刚刚讲了很多，也都讲的对的。但是我认为你的观点，总的观点，人工智能没有造成风险。

**宁越：**有啊，维稳领域风险已经有了。

**吕兆楠：**应该有风险，有什么办法把这个风险挡住或者延长风险？这是主要的。

**宁越：**这些大家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人工智能在所谓的强人工智能之前最好能够实现民主转型，否则真的都到地狱里去了。第二，婚姻方面，因为人的透明度越来越高、私密越来越少，可能会冲击婚姻制度，就是要允许个人家庭夫妻之间自己做一些新的灵活契约，就跟《大同书》里讲的三个月、六个月换伴侣就行了，夫妻之间的私下灵活协议都应该很好，据说在美国很正常，把大家惧怕的东西变成合法化就行了，就是去非法化就行了。也不要道德上谴责，因为以后基本上都是透明人了，而且本来人出来就是赤裸裸的，干嘛要把这种关系在道德和法律上搞得这样。

**吕兆楠：**对机器来说不影响到道德。

**宁越：**影响到人啊。 🍷

[【返回目录】](#)



## 何光沪：建立国际监管，预防人类浩劫 [人工智能问题系列思考之二]

[何光沪 著名宗教哲学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本文为作者 2018 年 7 月 11 日在「人工智能与道德风险」云豹沙龙的演讲，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何光沪教授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我在关于人工智能问题的一些演讲和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呼吁：“学会自我规限，预防灭顶之灾”！

那是从宗教角度对这个问题所作的一点理论思考——从上帝赋予人以自己的形象或性质，思考人类赋予机器以自己的形象或性质；人类特有的这些性质，第一是自由，第二是心智，第三是创造性或爱心；人类创造机器人，即人工智能，就是把自己的部分形象或性质，比如，把“智能”即理性思考的能力，赋予了机器。

从宗教角度出发，会发现人类在这件事情上，既滥用了天赋的创造性，又受制于天生的局限性。一方面，人想要创造出具备智能甚至超级智能的机器，有几何级数增长的学习能力，有威胁人类生存的繁殖能力的机器。另一方面，人没有能力赋予机器或者人工智能以良心，同时又没有能力防止它们获得自由，即自行抉择的能力。于是人工智能就可能有智而无心；很多专家认为，超级人工智能会获得自行决策的能力，即哲学上说的自由。机器人有自由而没良心，那会极其恐怖。

另外，人工智能的创造要依靠物质、需要能源和原材料，这可能导致与人类争夺资源，导致冲突，因此会有极大的风险。

前面谈的主要是一般性的问题。现在我想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呼吁：“建立国际监管，预防人类浩劫”！

这是从现实角度对这个问题进一步思考，可以分成三点。



目前，规限生物克隆技术在人伦道德方面的关注与讨论极少，诺贝尔奖获得者**乔舒亚·雷德贝格**博士认为：“在哺乳类或人类中完成这项工作绝不会有特殊困难”，但是“它把人类推到了一场进化上的大骚乱的边缘。”

## 一.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社会结果，有很多例证都说明，对之进行监管十分必要。或者反过来说，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证明，听之任之是危险的，毫无规限地任其发展，对其应用缺乏适当的监督、管理和指导，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例如，避孕技术的发展，对传统性道德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人工受精和代孕技术的发展，对亲子概念和亲子关系造成了冲击；堕胎手术的便利，已经杀死了许多婴儿；胎儿性别鉴定的技术，如果不加以监管，在很多传统文化的环境当中，比如在中国和印度传统文化的环境当中，会造成人口性别的严重失衡，以及婚姻方面巨大的社会难题。

又例如，如果对生物克隆技术不加以监管，在那些仅仅追求利润或名声，或是仅仅被求知或好奇所驱动的海量的研究人员或研究机构那里，难免会埋下危险的种子——有朝一日造出克隆人或半人半兽怪物，从而威胁人类社会的伦理、法律等等基本秩序。

还有许多例证，例如对制冷技术对地球臭氧层的破坏，热能发展和碳排放对大气层和气候的破坏等等，更是总所周知。

由于绝大多数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很难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去思考这些涉及到社会伦理、法律权利，甚至历史发展、文化文明、人性变化的问题，所以，伦理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哲学家、宗教学家等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专业人士，就应当而且必须对这些表面上只属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言献策，甚至提出监督管理的建议。进一步说，国家的立法机构更应当考虑和讨论这类建议，并采取及时而必要的立法行动，制定措施，督促执法机构加以执行。

因为这些问题，关系到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活，甚至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

## 二.

事实上，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不仅是国内的监管，而且是国际的监管。

由于科学的发展进步没有国界，技术的应用结果没有国界，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也是跨国进行；又由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飞跃，使得现代社会进入了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时代，因此，科技发展的影响，不论是好是坏，绝不会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些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对影响重大的科技发展，就必须进行国际监管。



**比尔·盖茨：**

“数十年之后人工智能将会足够强大以至于成为一个威胁……  
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对此并不关心。”

人工智能现在正在开始发挥越来越重大的影响，而且即将对全人类的生活产生全面的、深远的、颠覆性的影响，在这个领域进行国际监管，应该立即提上国际合作的日程。

原子能方面的科学技术及其应用，是一个重要的例证。首先，核武器的使用会造成巨大规模的人员伤亡，会使得更大规模的人群罹患绝症，非常痛苦，生不如死，甚至会造成人类文明的灭亡，以及一切生物的灭绝和地球生态的毁灭。其次，核能的和平利用，尤其是核电的使用，也未彻底解决核废料长达 10 亿年之久的放射性危害的问题，而且未能完全杜绝核泄漏的发生（切尔诺贝利和福岛都是例证），而泄露的污染和危害范围，也是超越国界的。这里还未提到一些国家掩盖了针对别国的、为着战争目的的核能发展。

因此种种，从爱因斯坦这类科学家和广岛投弹美军飞行员的反思，到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国际检查活动，反映了人类对这类科技成果负面作用的共识。这种亡羊补牢式的思考当然很重要，

但是有些事情，如果亡羊再来补牢，则为时晚矣！



1986年，前苏联乌克兰普里皮亚季地区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辐射线剂量释放是二战时期于广岛原子弹爆炸的400倍以上，  
造成欧洲最大环境灾难，  
直接经济损失总共约两千亿美元，是近代历史中代价最“昂贵”的灾难事件

因为超级人工智能极可能来得很快，并以几何级数的速度迅猛发展，所以，对人工智能研发的国际监管，事实上越早越好！

### 三.

斯蒂芬·霍金 (S. Hawking) 指出，人工智能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不亚于核武器。这已经向我们指出了事情的严重程度。他又说，人工智能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事情，也可能是最坏的事情。我们当然应该争取最好的事情、避免最坏的事情。不仅如此，正如卡鲁姆·蔡斯 (K. Chace) 在《人工智能革命》中所说，对付人工智能的巨大挑战，这场战争不能输，因为获胜的奖品是绚烂的未来——坐享一切，长生不老；失败的惩罚是灭顶之灾——人类灭绝，甚至更糟。

既然是灭顶之灾，那么即使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也应该作出一万分的努力去避免。实际上，在当今的国际局势下，人工智能的研发，分散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机构，包括国家机构、军队机构，以及数不清的跨国公司、私人机构甚至“车库”当中，这就大大增加了危险发生的可能性。总所周知，军事机构研发的，可能首先是破坏性的或杀人的机器人，所以负面作用或危险发生的可能性，也因此大大增加。

在一些人工智能研发能力很强的国家当中，民族主义的高涨当然也会大大地增加危险。例如在全世界人工智能研发能力最强的中国和美国，如果让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让“零和思维方式”、“高地思维方式”（“占领高地”是军事用语）占据主导地位，人类的命运就岌岌可危了。在这种情况下，光讲“自我规限”是远远不够的。“自律”的因素必须加上“他律”和“共治”的因素，

加上“法治”和“强制”的因素。或许，要比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管更强、更严才行。或许，应该由联合国安理会这样的机构，来对各国和各机构的人工智能研发进行适当的监督、管理和指导。



**史蒂芬·霍金：**“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崛起，要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事，要么是最糟糕的……人工智能有可能是人类文明的终结，除非我们学会如何避免危险。”

在此我谨建议，这项工作应该从下述三件事情开始：

要研讨并且确认人工智能现在已经和未来将会对全人类（不止是对一个人群、一个国家）产生的益处和害处、福利和危险。

要研讨如何整合全世界的研发资源,共同防止“强人工智能”获得自我决策能力或脱离人类控制的能力(包括防止作战机器人滥杀平民)。这需要在科学上和技术上(不仅在哲学上)定义“自主决策”。

要研讨制定规程，让各国、各机构定期报告和专项报告研究项目、研究计划和研究进展，接受检查和核查，并且执行国际监管机构的决议。

谢谢！

2018年7月于北京

**注释：**

现在霍金 (S. Hawking)、盖茨 (B. Gates) 还有马斯克 (E. Mask)，都联名呼吁要立法限制人工智能研发。 🎲

[【返回目录】](#)

## 王焱：透过计算，支配世界

[**王焱** 政治学、社会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公共论丛》主编；曾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读书》、《社会学家茶座》等著名学术期刊主编。本文为作者 2018-7-11 在「人工智能与道德风险」云豹沙龙的演讲，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王焱**

AI 的讨论网上很多，以前也看过一些，并没有特别关注过，这次开会前看了看资料，我觉得不管人工智能如何发展，至少到目前，经典的社会理论框架里还能容纳这些问题。

1917 年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大学有一个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当时是德国在参加一次大战，国内又有人鼓动革命，社会动荡，乌云笼罩，大学生期望他能够指导一下，面对乱世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立场，结果韦伯也没回答学生的问题，他讲的是在当下学术怎么样能成为一种志业。他在讲演里边已经概括了他眼中的现代社会，第一就是，我们的时代是个“透过计算，支配世界”的时代，这意味着这是个工具理性特别发达的时代，而其他的行动类型正在逐渐萎缩。

人工智能说到底也就是一个“算法的革命”。无论哪种人工智能，现在计算上没有超出以往设想的那种能力，特别像超级计算机。据最新公布的数字，美国名为“Summit”的超级计算机的浮点运算速度可达每秒 20 亿亿次。听说中国的超级计算机，经常是在那儿闲置的，因为这个计算机造出来了，但是提不出计算的方案来，什么问题是值得你进行超级计算的？每秒 20 亿亿次。我们的创新能力差，尽管超级计算的能力有了，但是你设计不出要计算的东西来，这是中国的一个特别情况。但是按韦伯的说法，透过计算支配世界的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它在手段上、功能效率上突飞猛进，但是价值与目的方面的理性考虑越来越萎缩，这就出现了一种极大的不平衡。

**何光沪**：还有一个题目可以计算，14 亿人怎么想。

**王焱**：光沪这个问题恐怕不是计算机能够计算出来的。工具理性的发达，其他的行动类型逐渐萎

缩，按韦伯说的，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有传统型的、情感型的、价值合理型的、工具合理型的。人工智能不管怎么发达，比如说 AlphaGo 给它输进既定的围棋游戏规则以后，你可以计算在这样的规则下，怎么样能通过算法制胜。电脑发明以前，都是一代人一代人自己发明自己的棋局，人寿几何？速度很慢。现在用电脑可能每秒钟几亿亿次，可能把以往你穷极人类的想象也做不出的那些棋局发明出来，所以棋手柯洁后来说，现在人得向电脑学习。他下棋的对手是电脑，电脑的棋局我们都想不到，甚至理解不了。但是围棋的游戏规则还是人给机器输入的，怎么叫赢，怎么叫输，电脑是在这个既定规则下演算。所以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还是在工具理性的框架内，在既定规则既定的目的之下的发展。相比之下，价值理性就不行了，这样高的运算速度，目的何在？在社会政治领域内，韦伯嘲笑过那些只讲价值正确、目的正确的人，最终只是“没有结果的亢奋”。但是只讲工具效率，不去思考目的的类型蔓延世界，也许结果更可怕。



马斯克与 Y Combinator 总裁萨姆·奥特曼 ( Sam Altman ) 成立了非营利机构 OpenAI ,  
旨在预防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韦伯这一派的社会理论，严格区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并没有反思能力，也没有价值观。你看一颗恒星在那儿，不会说自己的价值观变了，它就挪了一个位置。但是人文社会研究就不同了，它们研究的对象是人，人有价值观，有反思能力，他不但要在手段的意义上，追求功能与效率，还要价值的实现，还要追求目的和意义。所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不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人工智能也一样，我们把它看作一种拟人化的智能，但是有些东西它自己发明不出来。还要靠人类为它输入。下棋的规则是人制定的，不是机器制定的。机器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也是由人指定的。即使人工智能自己有创新能力，那也是在既定的规则范围之内的创新。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说是古代兵家思维的畸形发展，在给定的目的之下取胜就行。不可能自己发

明一个规则或确定一个目的，自己能发明一个规则或目的，你就不是人工智能了，就是人类了。

韦伯演讲正好已经过去了 100 年，人类社会的百年，他的预测并没有过时，这首先就是透过计算支配世界的的能力突飞猛进，所以他定义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工具理性化的时代。人类的价值理性却没有什么进展。但是人类的奇特之处就在于有各式各样的价值观，各式各样的情感，人类的行动必然依据一定的价值观进行。现在的无人驾驶汽车就遇到这种伦理难题，你在公路上行驶，左边有一个小孩，右边有一辆车、里面有一车人，你要避让就出危险，你是选救这个孩子呢、还是选择救那一车人。你要是像功利主义者那样思考，可能就会牺牲那个孩子吧，另外一边有一车人呢。但是无论人怎么选择，还是有一套想法的，有一种理据。但是你把这个交给无人驾驶汽车，它就没法选择了，所以我估计无人驾驶汽车也遇到瓶颈了，要是人还好办，要是车给它设定牺牲那孩子，就难办了。包括无人机之类的，像阿富汗发生的这种情况，你设定的程序唯一目的就是取胜，不是人道主义，不是雨果说的，要用一个孩子的无辜牺牲，哪怕给我至尊的帝王之位我也不换，但是无人机不可能这么想，它就是取胜，没有什么人道主义这类的考虑。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1864—1920]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  
古典社会学理论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  
其对现代社会理论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人类社会拥有各式各样的价值观，现代人类社会已经进化到那种程度了，自从洛克的《宗教宽容》一书以来，我们一般人对于各式各样的价值观大都能够兼容，认为各种价值观都有其合理的方面，但是我们每个人还是有自己的价值观，对于人工智能来说，价值观你怎么给它输入呢？这就是一个难题了。

现实中的人我们知道，某人被人定义为“脑残”，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说他脑残，就要消灭他，他的脑残价值观也许也有他合理的地方，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可将人工智能定义为“脑残”，因为他只有

工具理性而没有价值理性，没有情感。80年代读韦伯的时候，觉得他太悲观了，工具理性的发达，也有若干正面意义，至少它导致了人的福利的提高。但是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造成的结果是，在我们的前面，“不是鲜花灿烂的春天，而是严寒肃杀的冬夜”。在韦伯看来，这主要是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发达和价值理性相对的萎缩，加上官僚科层组织的发达，这两点使得人类的自由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桎梏。有一本美国学者米茨曼研究韦伯的书，题目就叫做《铁笼》，说人类未来发展的趋势，就是人类日益被自己打造的铁笼所囚禁，不管人工智能如何发展，在前面等待着我们的就是那个铁笼。

现在包括人工智能，无论是掌握在大资本家手里，还是专制者手里，确实给你打造好了这样的铁笼，只不过以往的帝王都想不到今天控制社会能够达到这种程度。这在美国好莱坞的很多电影里都有反映，一个独裁者背后有一个超级计算机的大球，可以即时监控全世界，你是谁、你正在哪，你在干什么。过去，秦始皇时代是腹诽心谤者要杀头，但是他并没有一个监控的手段知道你怎么就腹诽心谤了。现在就行了，能监控你的一举一动，你在想什么做什么，都能知道，都能监控。你在哪儿消费了，你上午手机支付，买了一包方便面，下午到天则发表了一通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风险的演讲。现在的人确实面临着很多风险，包括大数据，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一个信息产业的老板能看见每个人在做什么，我们就看不到。这就是所谓的垄断信息的资本家，像中国这样的社会，大数据掌握在少数个人手里，确实存在一定的大风险。

**何光沪：**现在的云服务。

**王焱：**但是人之为人，不是人类设计的电脑，对于民众而言，他可能今天这么想、明天那么想，你很难给他定义成一个僵死的不变的东西，固定的东西。莎士比亚写的《尤利乌斯·凯撒》，里边的民众今天说拥护杀死凯撒的人，因为他要独裁要破坏罗马的共和体制；明天又说杀死凯撒的人才是真正的阴谋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西方大学讲政治哲学经常拿这个当作教材，用来说明民众不可靠。但是实际上人可能就是这样的。

人工智能虽然发达，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人工智能还没有自我意识，它虽有智力，但是仅仅是一种计算手段效率的智力，没有权衡目的价值的智力。如果以目的-手段来定向，对于正常人类来说，可以说 AI 还是个脑残。

人的价值观从哪儿来？能否输入给电脑，那种价值观应当优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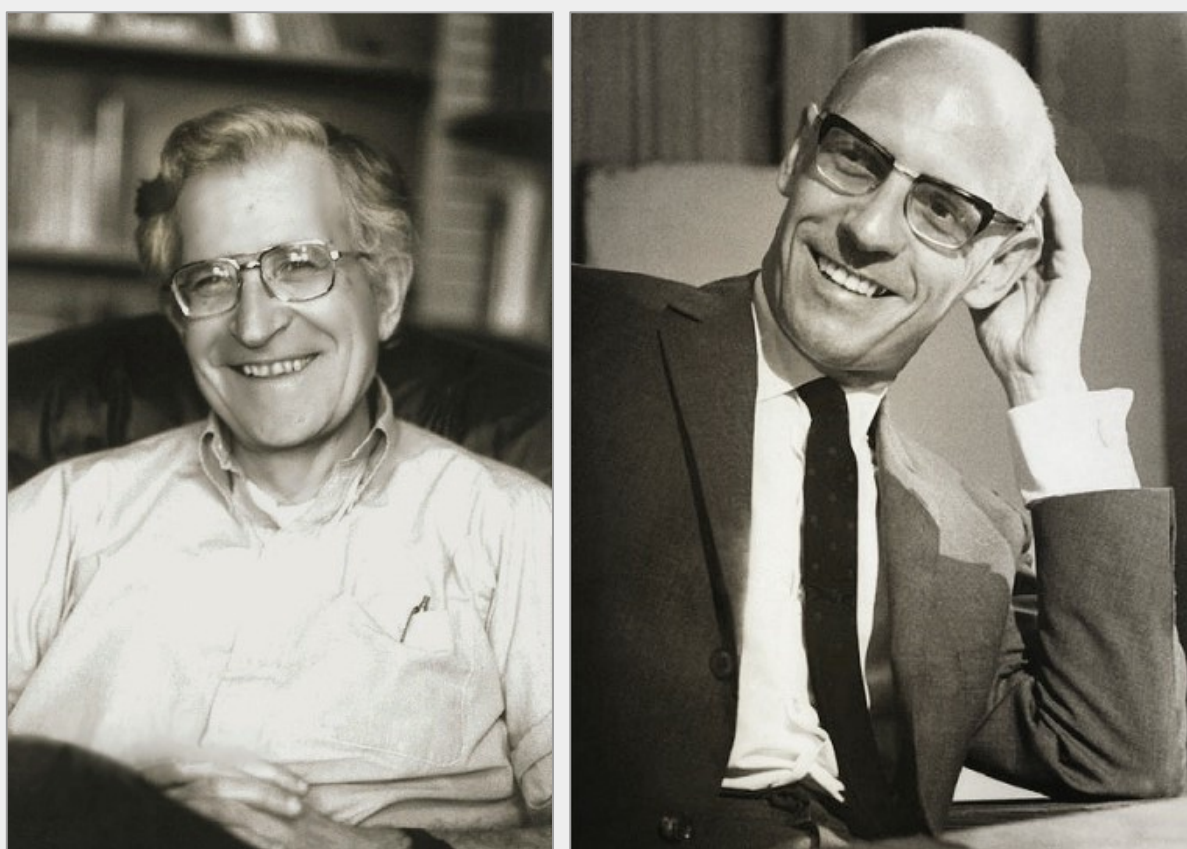
有些电影里我们看到的，做这个机器人的工程师给机器人输入一条绝对律令：绝对不允许违抗制造你的主人，机器人还可以分析主人的音频、分析出你是不是真的主人说的话，你说的他不能违抗，绝对不能。否则他的智力超常，把你杀死了怎么办。绝对律令是造机器的人设定的。但是这个主人也不见得就是好人，可能是专制者、要当法西斯，发展到后面，很可能谁掌握的机器人多谁就是老大，就像以前说，一个奴隶主有多少奴隶，他有一千个奴隶，厉害！他有五百个，就差一些。他有五百个能够控制一个地区，有一千个机器人就能控制世界。

人工智能的价值观没有解决，现在还是设计它、制造它的人能给它输入一些规则和戒律，按现在

这种发展，实际上还是工具理性的发展，机器人执行一个命令，命令是工具理性的，就是说你可在最短的时间内计算出最优的解决办法。但是机器人并没有能力选择，认为依据我的价值观实现这个目的是不道德的，所以我就怨难从命，不行动，至少现在的人工智能还判断不了。

在人类的控制之下的人工智能，应当说是眼耳鼻舌身的发达，这是人的器官的一个延长吧，行动能力效率的增加，但现在已经面临那种危险了，就是刚才说的，他可以利用他的这种工具化的延长、效率的提高，实现不道德的目的。以人类现有的法律，第一你也跟不上，第二，有的国家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能维持这个权力干什么都行，人工智能干什么都行，用来实行监控，实现各种目的，你看什么书、上什么网、跟谁聊天，我都给你总结下来、记录下来。

**何光沪**：现在已经做到了，东德可以做到。



1971年11月，哲学家**福柯**（右）与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被请上荷兰电视台持续几个小时的辩论，被认为是20世纪一场意义重大的“世纪辩论”，双方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虽有分歧，但在国家观念和《世界人权宣言》价值观的冲突方面，认识一致，福柯认为最紧迫的事，是将所有隐藏的政治权力的关系指出并揭露出来，是它们真正在控制社会，人们认为它只存在于政府手中，政治权力也通过某些中介机构来行使，这些机构看上去似乎与政治权力毫无关系，其实不然

**王焱**：就是一个工具理性，失去了价值理性的制衡，实际上还是韦伯说的，我们需要的不是单纯的工具理性的发达，我们需要的是目的理性的权衡，你的理性能综合的均衡考虑你的目的是不是符合道德的、有价值的，然后再来考虑你的手段的效率优化问题，如果你不考虑目的，只考虑不断增加手段的

功能效率，确实有很多危险。如果落到比如说心理阴暗的个人手里，确实会给人类带来危险。以前看福柯写的“人的消灭”，觉得有点危言耸听了，现在看人类从有文明到现在大概也就六千年，现在快到了自己消灭自己的时候了，包括人工智能或者生物医学工程。前两天刚看到德国一对夫妻做实验，把两个受精卵交给医院，医院给了他们一笔奖金，他们俩就玩儿去了，那个受精卵不断的发育，最后6个月那个医院就说行了，不需要10个月就可以出来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根据他们俩的审美要求，鼻子要高一点，最后就成了一男一女，就是这对夫妻的孩子。

**何光沪：**人工子宫。

**王焱：**对，生物医学工程也挺可怕，这种以前被认为是上帝的密码的东西，现在掌握在人的手里，你可以把基因剪辑来、剪辑去的，现在不但植物，人自身也要用这种基因工程，不知会造出什么怪物来，你说有生命、还是没生命，或者对他可以应用人类的道德、还是不可以应用，都是没研究过的新问题，生物医学工程可能比人工智能危险还更大一些。实际上，人类自己就要杀死自己了，各种离奇古怪的办法。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时代，需要开放性的讨论，需要各式各样的办法，不见得是那种民主的办法，但是要有方法来防止这种后果吧。这些问题，没有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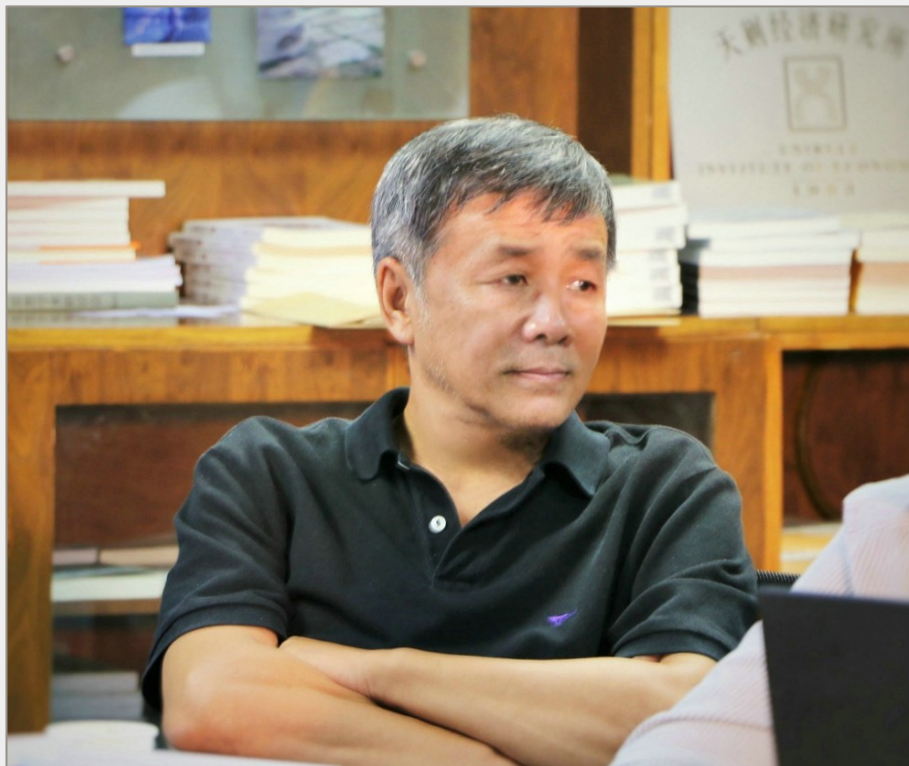
我就是想到这些人工智能的价值观谁给他输入，我们是给机器人输入奴隶的道德呢，还是主人的道德呢？这是尼采的说法。如果是文革时期，我们会尽量输入什么三个坚持、四个无限的价值观，如果满街都是这种机器人那也挺恐怖的。这个价值观的输入谁来掌握？比例多少？你认为哪种价值观是最合理的？我觉得现在总的趋势还是在韦伯百年前预言的框架里，确实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这个是需要研究者要花费力气来研究的。

另外一个后果是，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使得以前人类自身拥有的一些东西大大贬值了，人具有知识、情感、意志、美学观点，像莎士比亚当年讴歌的，人是多么伟大，多么高贵，不就是因为你有这些东西吗，人工智能如果能模仿这个，那就不知会走到哪里去了！无论如何，那些缺乏创造性和创造性思维的人，将会逐渐变成贬值。 🍷

[【返回目录】](#)

## 盛洪：生产能力和道德能力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作者 2018 年 7 月 11 日在「人工智能与道德风险」云豹沙龙的演讲，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盛洪

谢谢蒋豪。我肯定没有像光沪讲的那么深，但是受启发还是有一些想法的。我觉得人类发展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生产能力，一方面是道德能力。近代的很多理论学说只看到一个维度，比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看一个维度，这个维度就是生产能力，生产能力不断前进。当然还有其他学派也有这样的思想，什么是好，就是生产能力更强。其实它们没有看到另外一个能力是道德能力。我觉得道德能力应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适用于大众的，就是由大众互动形成的某种习俗、习惯、惯例、传统。这实际上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说，互动的人们在生产能力上比较相似，他们不断的交往，交往以后就形成了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大家发现我们遵守这个秩序能保持一种均衡，不会产生一种不平衡或社会的冲突、动荡和断裂。另外一种就是精英层的道德能力，就比较高了，宗教人士、士大夫还有一些文化精英，他们的能力不仅是对习俗的遵从，而且是对习俗的思考、总结、提炼形成一些更为凝练的道德价值的描述，最后形成我称之为的“文明经典”。这个文明经典又成为一个传统，不断的扩散和传播下去。围绕文明经典就形成了一个文化精英阶层，这个阶层在社会中起到某种骨干作用。

在一个技术相对稳定的时代，由它决定的这样一个道德形式，尤其是民间形成那种习俗习惯传统，也相对稳定。大家的道德能力首先是受到了基本不变的那种生产能力或技术水平的稳定性的保证，因

为由于生产能力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大家谁也没有更多的优势，在这种生产能力之下形成这种习俗习惯是相对稳定的。大家借助于对习俗、习惯和传统的遵从，保证他们的道德能力与他们的生产能力相匹配。如果出现了一种技术创新或革命，而这种技术革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部分人优先掌握，他们在生产能力上产生某种优势，这个时候严格来讲，过去人和人之间遵从的道德规范或者说习俗、习惯和传统，就崩塌了，因为原来的习俗习惯在人的生产能力都差不多的情况下，你打不过我、我也打不过你，我想抢你也没你劲大，现在不是了，现在我想抢你很容易，我拿把枪就把你抢了，因为你没有枪。传统的自发形成的伦理规则就崩塌掉了，这是任何发生技术变革时代应该特别关注和警惕的，因为大家总是一味的看到了新技术或者更高的生产能力，给掌握这种新技术和生产能力的人带来的好处，没有看到这些人利用这种优势，相对于没有这种优势的人之间，又会出现对原来那种道德均衡的破坏，甚至对没有优势人的一种侵夺，这种情况其实经常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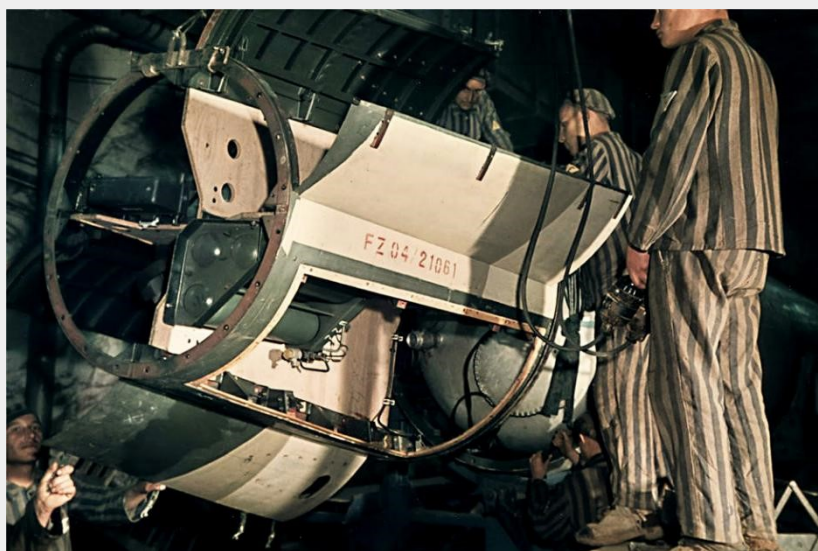


世界上第一宗机器人杀人事件  
发生在 1978 年日本广岛一家工厂的一名值班工人被切割机器人误杀，

我觉得在近代社会是非常明显的。近代以来，比如说西方人先有了更高的生产能力，很快就会把这种生产能力运用到怎么能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利益方面，这必然打破过去那种道德均衡，其实它就崩塌了。所以近代以来那种东西方的冲突就在这儿。这种情形到了现代仍然有演进，比如说这样一种生产能力带来的现代武器，会导致其它一些国家的冲突。我看到非洲经常有动乱，一个人拿着枪的第一个想法，不是要保持人们之间和平的均衡，而要拿这个枪消灭那些过去一直跟我抗衡的人群，所以在近代也能看出，非洲会出现很多血腥的事情，这只不过是近代以来所有事情的重演，西方殖民者对于

非西方人的类似情形的重演。

在现代人工智能的框架下也会出现这种情形。假如这种新技术不是为所有人所掌握，只是为一小部分人所掌握，这少部分人一定会利用这种优势打破原来的均衡，比如我能猜透你，我为什么不用这个优势来从你身上攫取更多的利益呢。这可能也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之间，假如谁更有优势，谁就占更大便宜。当然这个说法其实是很古老的。大家都知道，技术的竞争很快会用到国家层次，包括欧洲也是一样的。很多人说科学无国界，那都是胡说。科学一上来就跟国家层次是相关的。不要把科学家打扮得那么纯真，不是那样的。很多科学，如计算抛物线，是计算炮弹轨迹的；那些化学公式是干嘛的？是炸弹配方。瓦特改进蒸气机，法国人就想买，幸亏瓦特爱国，没有卖。人工智能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假如人工智能被一些人垄断的话，可能会对没有掌握人工智能的人形成一种威胁，而且这个威胁一定会打破原来的那种道德均衡。原来我们都挺和谐，但是必然要打破，所以不同国家之间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1944年，纳粹德国在布痕瓦尔德附近的哈尔茨山开挖隧道修筑秘密军工厂，成功研制了V-2导弹并投入战场，致使二战即将结束前2万余法国人、比利时人、苏联人和波兰人葬身于此

但是这种情况我觉得不是最严重的，因为好像现代技术不断在扩展，很快就会从一国扩展到其它

国家。但是也不能完全否定有这种危险，比如现在为什么各国把人工智能当成国家战略，这个不要回避。有些人想到怎么去杀人，当然也有很多人反对。但是即使不用来直接杀人，也可以间接杀人，如可以用人工智能来分析敌情，可以制定我的战略等等，其实都包括了。假如真有这种人工智能的话，可能有些国家在战争上就更有优势。

**吕兆楠：**无人机就是机器人。

**盛洪：**无人机带来很多道德问题。

**吕兆楠：**它可以炸掉你，也可以送东西，一个好的、一个坏的。

**盛洪：**技术本来是中性的，无人机就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有了无人机可以任意去炸，类似于去暗杀，道理是一样的。

**宁越：**有人用无人机把俄罗斯总理的财产侦查了一个遍。

**盛洪：**所以有好、有坏。

**吕兆楠：**现在无人机可以快递，这是好事。

**盛洪：**人工智能、大数据，仍然存在人群之间的那种鸿沟。普通的消费者和一个巨大的交易平台、服务平台，比如像阿里巴巴，亚马逊，优步、滴滴这样的，会产生由于大数据、由于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垄断。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人指出，优步或者滴滴公司有大数据的时候，经济学的说法，可以产生非常实时的歧视性定价，你收入是多少、你是哪个阶层的、你住在哪儿、你现在上班还是下班、你现在是不是快迟到了，全知道，你快迟到了肯定要多加钱了，然后我就趁这个机会就给你加钱，大数据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个问题已经被发现了。

**吕兆楠：**没有隐私了。

**盛洪：**这就有问题。所以人们绝不会遵循过去形成的那种道德原则，甚至变得更恶劣。再一方面就是政府了，刚才谈到了，这就是专制主义者的第一个想法，我拿着人工智能、拿着大数据监控所有的人。这也是一种理想，我能控制所有人。

**何光沪：**刚才我接一个电话就是叫我不许参加这个会的。

**盛洪：**所以这就是专制主义可能利用的，有可能导致更为专制，这也是对人类社会的破坏。专制可能有这种优势，你在哪儿我知道，你到哪儿发言我知道，你脑子里想什么我恨不得知道，我搞这个公式把你判成什么样的人，我还给你评分，参加一次会给你加一分，加十分枪毙。这也是人工智能带来的负面的影响。我们不能光看正面影响，也有负面的。

所以我说，我倒不是特别赞成光沪那个说国际管制，问题是，谁来管制。但是有一点要求，人工智能一定要某种意义上强制性普及，你不能形成某些掌握人工智能的那种垄断优势，而有些人不知道。我觉得比如将来人工智能应该双向的，比如现在手机，每个人其实都拿着一个计算机，这是手机，其实这是一种普及，这种普及，我觉得随着技术的发展，是在消解那种用人工智能做坏事的可能性，当然这种普及包括了不同民族的、不同阶层的、不同角色的，不是你是交易平台，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交易者，

我们俩不平等，不是的，我们是对等的。

从这来讲我的想法是，这个技术革命所带来的那种对道德均衡的打破，往往是通过技术革命的普及来解决。最开始贵族有一把刀，是很贵的，一般人是买不起的。这个技术普及了，每个人都有一把刀，这个贵族的优势就没有了。手枪、热兵器发展之前，男女之间力量不平衡，男的力量大。现在女的拿把枪，男的力量优势就没有了，就促进了男女平等。还是这个枪，像美国，大家都有枪，政府有枪、警察有枪，我也有。

**吕兆楠：**持枪合法化。

**盛洪：**技术的普及造成了一种力量均势。所以我们要求的就是，最先进的技术一定要公布给大家，或者制成大家能用的那样一些设备。当然这个做法还是回到经济学家讲的，我们要市场制度、我们要竞争、反垄断，人工智能要反垄断，尤其现在比较严重的垄断，一个是政府的垄断，一个是大的平台的垄断，所以我觉得这两者可能是最值得关注的，你要管制就管制这两个垄断，政府不能用这种技术去控制公民，这就侵犯了公民权利了，严格来讲，这不是管制，是宪法约束。大平台也是一样，将来你那样做就是垄断了。

**吕兆楠：**要强制他。

**何光沪：**我这两天看到电视上天天有扎克·伯格，扎克·伯格国会对他的询问，他不是有意的泄漏一些东西，控制都能控制，搜集情况都能搜集，但是不能用来伤害你，是这样的。他那个法律是不能上让伤害人，因为他有伤害人，所以把他天天叫来审问他。

**盛洪：**美国人非常敏感这个问题，有很高的警惕性。如果拿这种技术伤害民众，很可怕，所以国会让扎克伯格去去作证，这是一个问题。

**何光沪：**是一个失误造成的。

**盛洪：**最后我想讲一讲，人工智能本身是不是构成对作为整体的人类的威胁。我觉得首先，如果人工智能有威胁的话，就必然有它的自我利益，没有的话就不会，有自我利益就接近于人了，它是那个主体，它有主体感。而现在只是一个计算的速度快的问题，现在人工智能是一种没有身体的人工智能，关键是不构成有自我意识和自我利益的主体，我认为没有关系的。人工智能再厉害只是人的一部分、是一个工具，比较可怕的是有人利用它来伤害别的人。

另外一点，人工智能有没有道德呢？我觉得可以有道德。道德怎么产生的？道德其实是互动中产生的，假如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之间互动，它们一定会产生某种自发秩序，就是某种习俗、某种规则，在比如说一群人工智能中间会形成某种平衡，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基本逻辑，你要保证这个人工智能活别的也活，而且它们之间比较均衡的话，这个逻辑跟人是一样的，所以不是要教它们道德。人们现在的想法，是一种建构主义形式，我告诉你有 10 条道德你就遵循，当然这是可以的。还有一种，你从来不告诉它们到底什么是道德，它们会不会知道呢？你要弄一群人工智能，互动多少次以后一定会有，这个也挺有趣。我们的经济学家，包括我们信奉哈耶克自发秩序的人，我们都可以搞这个实验，我买一

群人工智能的小机器人让它们去互动。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它们之间一定有某种规则。我们坚信自发秩序，就坚信有这个结果。所以我说人工智能最后还是有道德的。

**吕兆楠：**请问一下盛老师，你刚刚讲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说，机器人到最后他也会自立的，机器人这个小团体会自立的，就是有道理。

**盛洪：**对，就是说它会自立，但是它不会达到人这样的自立程度。我刚刚说它们是不是有自我，你可以说他它有自我，你假设它有计算，但没有身体，但是它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比如蚂蚁也有自我，蚂蚁也可以形成规则，但是它们跟人的理性也是有很大差距。

**吕兆楠：**你讲的伊斯塔会自立的，他也有他一套规则的。

**盛洪：**其实道德说到头就是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只要有个体和群体一定有道德，它们就要互动，你不要给它们规定多少条道德戒律，你就告诉它们你们自己玩去，就会形成规则。

**吕兆楠：**或者这么说，你给他一个道德的行为，红灯要停的，前面人开过来你要停的，他有这么一个道德思路给他之后，他会发展的，狗爬过来我也听的，什么事情不好做的，他会自立的发展成为一个。

**盛洪：**不用给他一个规则说“红灯要停”，它最后就会停的。

**吕兆楠：**这个思维的初次输入是谁输给他的，人输给他的？

**盛洪：**不是的，你不停就要撞车，完蛋了，我偶然停了就没撞车。

**吕兆楠：**你的意思是，不要输入给它、它也会停，假如不停它也死掉了。

**盛洪：**这是有代价的，人类也一样，人类早期，刚与黑猩猩分手不久，死亡的概率大概 15%—25%，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就是人类有了国家以后大概降低到 3%—5%。现在很低。

**吕兆楠：**以前没有交通规则，现在有了。

**何光沪：**非自然死亡的。

**盛洪：**非自然，就是说暴力死亡，所以很多人才知道红灯是不能走的。有很多人类学研究，大概 3%—5%，随便有几篇文章、几本书都能找到的这些东西，人类大概是 15%—25%。

**何光沪：**你说文明之前？

**盛洪：**文明之前，所谓文明就是有国家以后。

**何光沪：**野蛮时代、原始时代。

**盛洪：**对。 ■

[【返回目录】](#)

## 蒋豪：人工智能爱与忧

[蒋豪 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天则所法律及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为作者 2018-7-11 在「人工智能与道德风险」云豹沙龙的演讲，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蒋豪

人工智能与道德风险问题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是一个伦理或者道德问题，甚至将来也会上升到一个法律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谈，第一个方面，我是偏乐观的；然后我再说一个悲观的角度，这实际上是不矛盾的。可以说对人工智能有爱有忧。

就专制与技术的关系角度来谈，我认为我们应该乐观。实际上大家看到，监控手段确实加强了，不管是通过互联网的摄像头、不管是其他的软件跟踪，政府的监控能力确实加强了。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传播手段也提高了，现在可以说人人都是一个新华社了。不像以前那样，大家只听一个广播、看一个电视台，只能通过新闻联播获得新闻。现在每个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建一个群，甚至建立公众号，就可以发布消息。如果你人脉广的话不止几千个受众对象，微博的话甚至更多，会达到几十万个、上百万个、上千万个粉丝。个人的影响力，现在甚至可能要大于很多地方电视台。据说有的地方电视台收视率几乎是零，几乎没人看了，我们要看到技术革新、技术的变化。

首先我认为这种变化还是公民个人主导的，对公民自由的影响更大。一般情况下，统治者利用了这个技术的发展，但我认为这往往要比民间的应用落后一点，要晚一些。虽然有的时候政府可能故意领导或者组织开发一种控制程序，这当然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包括区块链技术，网络很多的发展实际上都是为了逃避监管，区块链也是多中心去中心化。实际上这反映了大家努力从技术上逃避管制。因此，监控手段与传播手段相比，传播手段技术一般情况下会略快于监控手段。

第二个问题涉及特权者和非特权者。就是说在一个社会里，尤其在一个专制社会里，什么人

权者是比较明显、比较固化，比如红一代、红二代甚至红三代，但是这样的社会以哈耶克的自发自序理论来解释的话，从长远来看不是一个稳定的结构，不管是内部分化还是外部的冲击，总之从长远来看它是要分裂、分化的。从上述专制技术的角度来看，专制者早晚是要失败的。

这里还涉及价值观和人工智能价值观的问题。首先从人类这个群体来说，有两大比较独立的价值观，那就是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两者到现在实际上还在斗争，仍然没结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从表面来看仍然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从安·兰德哲学的观点来看，这是原始部落时代的痕迹，此部落以彼部落灭亡为代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狼与狼的关系，你好我就不好，我好你就不好，忽略了共同合作的可能，这是原始社会的思维痕迹在今天的表现。

但是个体主义的道德观和集体主义的道德观的斗争过程是个曲折的过程，虽然说最终这种个体主义的价值观会战胜集体主义价值观，就是因为个体主义价值观会创造更有活力的社会，社会的各种能力更强的一个社会，但是这个历史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就像当年纳粹德国也曾经非常强大一样，加上它的这种国家控制，加上一些人的思维上的懒惰，他们愿意相信一个领袖，愿意跟着走，比如纳粹德国最后在苏联攻入柏林以后，成人战死差不多了，最后一刻了实际上还有很多妇女、儿童还是继续在为纳粹德国战斗。如果德国官方不宣布投降的话，可能这个民族会有更多的牺牲。最终，自由的社会因为在活力方面会最终胜出。

在上述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可以是乐观的。

在人工智能的道德风险问题的上，我持悲观的观点，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我认为，在人工智能未来发展方面的问题上，确实存在更随意的、更不自律也不他律的那个社会，可能就会产生出这样一个超能力的、超级人工智能。这种情况下，它相比其他的比它低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广义人工智能甚至狭义的人工智能甚至人类，会具有这种更高的能力，这对我们人类来说确实是一种很大的风险。

实际上不光是人工智能存在这个问题，基因工程、生物学也有这个问题。实际还有一个领域，就是那些污染更强的技术，包括核工业、核能力、核武器，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凡是这样专门去强力发展这种核能的、能量大的社会，如果这种社会没有一定的自律或者他律的规则的话，这个风险也是很大的。包括马克思、米塞斯这些思想家都说过，在一定程度上，资本家具有毁灭资本主义的倾向。因为有时候他是短视的，只看自己眼前的利益，以邻为壑不讲规则，不一定看到长远的利益。 ■

[【返回目录】](#)

## 讨论与提问「人工智能与道德风险」云豹沙龙

[本文为 2018-7-11「人工智能与道德风险」云豹沙龙与会学者的讨论与提问部分实录，《中评周刊》首发，仅为有限发布，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蒋豪** (主持人)：这个会筹备已久，而我是临时来主持。

今天的议题“人工智能与道德风险”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因为大家知道，这些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非常迅速，尤其是 AlphaGo 在围棋街打败了人类最顶级的人类棋手李世石，使得很多原来都看不起人工智能的人对人工智能刮目相看，再加上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发展，使得我们对人工智能发展甚至有了一些担忧，会不会产生道德风险，会不会威胁人类自身。不管理论界还是在实业界好像有两派观点，有一派提醒人们要注意人工智能的风险对人类将来的威胁，比如马斯克，他是实业家，把火箭发射到火星上去了，这几年发展非常快，还有他的电动汽车，也是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如果他是个实业家的话，理论学界尤其是物理学界的霍金，霍金去世前也对我们有一个警告，也是对我们最后的警告，“慎用人工智能，不要开发人工智能武器”，也是对前景表示极其担忧。另外一派人，似乎也是传统的科学主义的这一派，认为科学是为人类造福的，似乎能够被人所掌握和控制的，比如扎克伯格和马斯克观点截然不同，认为我们不必要担忧人类的命运，认为马斯克的观点是错误的。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了国内在这个问题上有研究的几位著名的学者来深入的谈这个话题，有在哲学方面深入研究的人民大学的何光沪教授，还有知名的学者王焱老师，天则所的所长盛洪老师，还有国内最著名的奥派经济学家 .....

请这几位学者给我们分享一下在人工智能与道德风险方面的思想，最后我们有一个讨论和总结。

### 一. AI 时代 人类社会的权力关系

**陈威威**：我提一个问题，假如人工智能发达的时候正好掌握在纳粹时期会是什么结果，就是杀的更彻底、更快吧，人工智能在当年的纳粹手里的话，可能现在犹太人已经灭绝了，因为人工智能的搜索是完整的。

**蒋豪**：刚才宁越老师和你有同样的忧虑，宁越老师的答案是，在发展到这一步之前民主战胜专制，那就避免这个问题了。

**陈威威**：可是当年纳粹希特勒上台是民主上去的。

**宁越**：我说的是自由民主。

**蒋豪**：希特勒当总理是靠民主取得的，他上台之后马上就遏制了民主。以前几次选举没有多数党，始终没占多数，最后他那次是占多数了当总理了。他当了总理之后，兴登堡总统很短时间就去世了。我们国内以前很少报道，或者语言不详，说他自己封自己做元首。实际上他仍然是民主手段，仍然是全

民投票，绝大多数德国人同意总理和总统两个职务合一为元首，但是他当了元首之后其他的政党就被扼杀了、取缔了。



射速高于 1000 发/分钟的 MG42 型智能重机枪，  
是二战中纳粹独裁政府倾注国力研发的各种“黑科技”杀人武器之一，  
在二战东线战场 MG42 型重机枪制造了对苏战争中大量苏军伤亡，亦是西线盟军的梦魇，  
被盟军士兵称为“希特勒的电锯”

**王焱：**那个很偶然，希特勒二几年就开始研究原子弹了，有这个想法，只不过他们后面没研究出来，美国弄出来了，他研究出来了我们灭不了他了。

**蒋豪：**如果把原子弹当成人工智能的话，是有这样的问题。

**王焱：**要消灭了你也没辄，那就消灭了。

**何光沪：**他做的坏事也造成他灭亡，最近我在美国机场看一本书，没买，看那个书里介绍说，纪实的口述史，很多犹太人在德国遭到迫害，他们没办法，把孩子送到美国去，这些孩子全是犹太人，很多参加了美国军队参战，对于破解密码他们懂很多战略单元，比如在每一个连、排之类作战编制的，都要有一个这种犹太人，他们全是德语非常好的，比如说俘虏德国士兵的审问，从语言到文化，到德国人的文化心理他们都很熟悉，因为他们就是在那儿长大的，他们在战争中打败希特勒起到很大作用。

**王焱：**以后还有那种，普查这个民族人的基因，他可能有某种特异性的基因表达、而别的种族的人没有，他可以设计一种病毒，是专门消灭这个的。

**陈威威：**还有一个问题，专家涉及的这个领域，实际上人工智能辅助人们并不全是快捷的享受生活，可能人类在智力上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萎缩成婴幼儿，因为婴儿的“即刻满足”的获得需求，是英国的心理学专家认为需要通过家庭和社会防止婴儿把“即刻满足”的需求延续到少年和成年而不能融入社会，我们人类现在制造了人工智能就是要让人类回到那个婴幼儿“即刻满足”时期，不就变成痴呆了、脑残了，完全依赖机器人满足需求，就算智能人不会灭绝人类，它给人类带来的后果，这是好的后果吗？

# 美中英日四国AI战略布局对比

## US 布局完备，领先各国一大步

- ✓ 美国从顶层设计入手，规划了比较完备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
- ✓ 美国政府设立专职负责机构，推动人工智能落地
- ✓ 美国在AI人才方面举措超前，构建了完备的不同层次的人才梯队

## CN 提出AI发展规划，谋求成为世界中心

- ✓ 中国政府将人工智能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 ✓ 把高端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重中之重
- ✓ 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学科布局，设立人工智能专业，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

## GB 成为最适合发展和部署AI的国家

- ✓ 2017年10月15日英国政府发布了报告《在英国发展人工智能》，目标是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适合发展和部署人工智能的国家
- ✓ 人才方面，政府将为工程和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提供研究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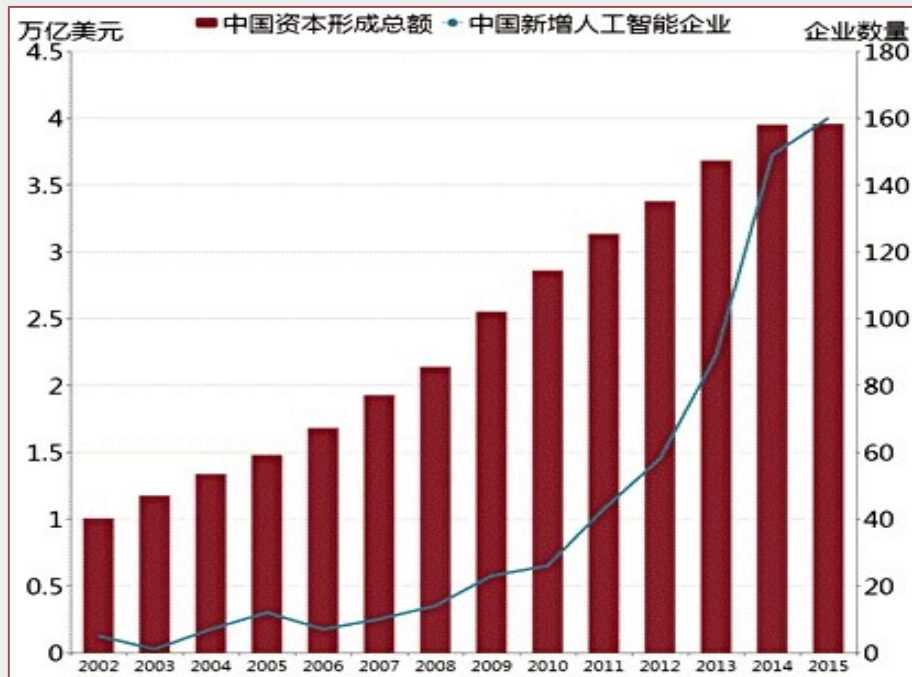
## JP 推行机器人战略，超智能社会5.0

- ✓ 2016年1月，日本政府颁布《第5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超智能社会5.0，并将人工智能作为实现超智能社会的核心
- ✓ 日本计划从2020年起，将编程列入中小学必修课程

**王焱：**就像法国哲学家、外交家亚历山大·科耶夫讲的，历史终结了，世界上都是“末人”，“末人”就是脑残的人，因为他没有什么政治上要争取的东西了，大家都平等自由了，大家就成傻子了。他认为自由民主普遍化以前是个好日子，你还知道你追求什么、争取什么，你到哪儿开会还有一大帮人监视你这是好事，到了“末人”的时代没人理你了。

**何光沪：**神学上讲恶的必要性，世界上有邪恶。

**王焱：**而且特别是，包括基督教，那时在罗马传教时期，罗马打压基督教，那时期就是基督教最蒸蒸日上，到了宗教都合法化了反倒都腐化了。



中国 AI 投资领域资本形成总额与新增企业变化图

近年来中国 AI 业投资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已成为最热门的投资领域之一

**何光沪：**宁越那个问题我有兴趣，甚至有人给我讲区块链，一些朋友发在群里，说你现在就可以开

始进入区块链的服务，可以加入区块链的项目，我不太会弄这些东西，匆匆忙忙的没时间去搞，后来那条微信找不到了，我就关心它能不能突破现在这种控制、这种防火墙之类的？



比特币 [BitCoin]

**宁越：**比特币就是基于区块链，比特币不是现在政府就指责它是非法转账嘛，与资产相关，因为你汇出去以后在国外有交易所，像美国都是允许的。

**何光沪：**但是不涉及真实的货币。

**宁越：**只要有兑换，主观价值论，别人认你多少钱，比如我这边买的时候是根据美国交易所的价格，比如说 4500 美元一个比特币，我买 10 个比特币。

**何光沪：**你是用人民币买的吗？

**宁越：**人民币可以，只要有人接收就行，你要付手续费的。

**何光沪：**还是要花代价的。

**宁越：**一般你是用人民币买，一般国内也有这种办理的，在某个账户上，他就帮你算成比特币，到了美国那边你的账户等于是你实际上还有一个比特币账户，钱包嘛，这个钱包没有国界的，你到那边这个钱包的私钥交给你的女儿，她直接可以到美国的交易所取出美元就行了，取出美元也许有损失，比如第二天，他大概还是要有，10 分钟才能出一个，他是挖比特币，10 分钟才能计算或者挖出一个，他这个计算时间比较慢的，10 分钟以后也许本来是 4500 美元一个比特币变成了 4300 美元，那你就自己承担责任。但还有一个可能，他涨了呢，他也可能涨到 4700 美元。所以你要自己承担风险，但至少你是自由的，它就是基于区块链的。

**何光沪：**国家角度就是说你把人民币换成美元了。

**宁越：**国家是认为换成美元了。

**何光沪：**控制社交媒体、控制舆论、控制言论，区块链可不可以打破呢？

**宁越：**内容控制还要中心化的，因为他怕内容上出问题，比如说恐怖分子来利用这个平台发布消

息，他还要中心化控制，但是他要搞区块链就可以搞积分制，比如有很多广告点击绿色，你点击一下给你一点奖励，数字货币，区块链里叫通证，一个证明，价值证明。

**李冰：**所有想监控你的，你都跑不了，技术是双面的。

**宁越：**比特币是可以逃脱政府控制的。

**何光沪：**李冰讲的那个同宁越讲的不太一样，你们是独立的，因为比特币可以逃脱政府监控。

**宁越：**比特币就是，你只要给我一个你的钱包地址我可以直接给你打过去，不需要交易所。

**何光沪：**不需要经过银行？

**吕兆楠：**但有风险。

**何光沪：**纸媒出版上，任何文章放上去永远删不掉。

**宁越：**比特币，任何一个政府杀不掉它，我有一句话就是比特币相关的，现在比特币区块链每交易一次、每挖出一个新的币，就是这个区块链多了一个区块，这个链的长度就最长，其中有一个区块链，我的一句話“宁越：每个人都应该学一点奥派经济学”。

**何光沪：**对我一个问题回答是肯定的。

**宁越：**你可以请一个“挖矿”的人写一句话比如打倒什么什么也是可以的。

**何光沪：**写一篇文章也是可以的？

**宁越：**文章写不进去，他现在还没有“侧链”，我说的是主链，主链一块一块加上去，是一个压缩的信息，比如说我一句话只能限定在多少字以内，不能太多，太多的话现在那个容量不行。打倒什么什么，五个字没问题，你可以请“挖矿专家”给你写进去，你只要发泄一下就能身体健康活到 120 岁。

**陈威威：**区块链如果是在自由的正常的人手里可能变成一个特别优越的好使的工具，反过来政府怎么可能不去垄断的使用它呢。

**宁越：**区块链是分布式的，很多人共同维护的。

**陈威威：**区块链共同维护，可以啊，各地政府响应习主席号召。

**宁越：**数字货币。

**陈威威：**他要想控制当然可以控制啊。

**宁越：**但是还有一些民间自己搞的区块链，你也控制不了。

**陈威威：**如果说在宪法里加一条，民间如果掌控区块链是违法，你还能控制吗？

**何光沪：**有一个香港的例子，他专门搞这个事，就搞了区块链的群，用群体，他去要求大家加入。

**宁越：**你就搞一个新的货币，每一个区块都加你的话。

**何光沪：**说这个货币，我想侧重的讲，区块链不能只搞货币吧？

**宁越：**区块链搞出版业可以的，比如说大家都参与进去。

**何光沪：**你也写文章，我也写文章。

**宁越：**但是我也要发行某种代币，通证嘛，你用通证购买我出版的一本书，比如说 10 个代币。

**何光沪：**整本书可以电子版写出来。

**宁越：**我可以标价的嘛。

**何光沪：**我交了钱可以看这个书吗？

**宁越：**对，有智能合约，满足这个条件。

**何光沪：**按你这么说已经突破了，审查制度没作用了？

**宁越：**政府想审查嘛。

**陈威威：**他如果立法说，私人或者民间团体掌握区块链是违法的，等于大家去搞地下操作了。

**宁越：**如果你这个出版，他就要求你区块链油出口，就是有几个节点上有一些口，这些口子政府能切入来监控。

**陈威威：**那他也利用网络吧，如果他把你网络关停了，或者使用的时间是受限制呢？

**宁越：**你私下发行现在不也是可以吗，一样的。

**盛洪：**区块链有助于表达自由。

**何光沪：**刚刚说能够切入来监控。

**宁越：**你那个叫秘密通道嘛，现在就可以。

**盛洪：**他可以用这个手段，你也可以用这个手段，我认为专制的用这个手段必败，因为不仅是技术，而且是技术后面的人，这是很重要的。你得有区块链、你有这个技术，但是还得有人真正的去监控，监控也得有思想，那思想得跟你一样，监控越多，就需要越多的人，越多人的思想就没法把握。跟《监听风暴》是一样的，听着听着反而不想监控了。人是活的，专制即使用这个手段必败。

**陈威威：**我还有个问题，一个政府如果制造贫困，人在贫困底线的时候就只求解决温饱了，这个时候区块链掌握谁手里？

**宁越：**你发行通证就是有价值的，参加的人越多价值就越往上走，比如说参与众筹嘛，相当于我搞一个区块链，比如我们计划发行多少，然后我们现在先搞个区块链，然后图书一本一本出来，你发行的书越多，网络节点越大，加入的越多，这个通证本身就往上走，相当于产品众筹嘛，产品众筹就是我有100个产品、1000个产品，因为你搞出版的区块链是可以产品不断的出来的。

**何光沪：**现在已经有了吗？

**宁越：**现在国际上在用区块链搞图书馆管理。

**何光沪：**现在有霍金、比尔盖茨还有马斯克，都联名呼吁要立法，他们有这个建议。

**蒋豪：**这是很重要的。

**吕兆楠：**不要等机器人发展到可以杀掉你的时候再立法。

**何光沪：**它是几个技术。

**吕兆楠：**它发展很厉害。

**蒋豪：**我觉得用“高屋建瓴”这个词在我们场合是很合适的。

**吕兆楠：**经济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肯定会一直发展下去。

### **AI 时代是否加大贫富差距**

**宁越：**机器人的能力不一样，有些机器人很贵，然后能力很强，就是个武器。

**何光沪：**所以有些所谓悲观者，看到负面的人谈到这个问题，这个东西的发明和发展可以使人类社会极大的分化，像农民工不会玩电脑，很多东西处于劣势，他不会上网商银行，社会很难适应。这种情况，当有一个集团或者一个阶层掌握了最新的技术和强大的人工智能之后，没有为不能掌握这些技术的人带来更大的便利，而且鸿沟很宽、很深。

**陈威威：**贫富差距加大。

**何光沪：**简单是贫富差距，或者说掌握能力的大小，比如阶层之间的能力大小，鸿沟会变大、会加深，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刚刚讲实业问题，有些人比如说如果人工智能高度发展之后，大家都不用干活了，但是不用干活的人生意义呢？因为有些人还可以找到人生意义，或者说文化艺术、欣赏能力、音乐、美术等等，或者这方面的创造能力，或者交往，大家一块交往，这些东西的能力比较强的，他会觉得人生还是有意义的。但是有些人就会处于消沉状态，所以说他会使社会分化更加厉害，有些观点谈负面影响的时候。

**吕兆楠：**这也是道德问题。

**何光沪：**也是道德问题，对整个社会带来损害。

**吕兆楠：**何老师，假如说发展到最后，机器人比人类更优秀。

**何光沪：**按照趋势来说是必然的，只不过有些人认为时间长、有些人认为时间短，像马斯克这样的人他就认为很快。

### **AI 时代的信仰与宗教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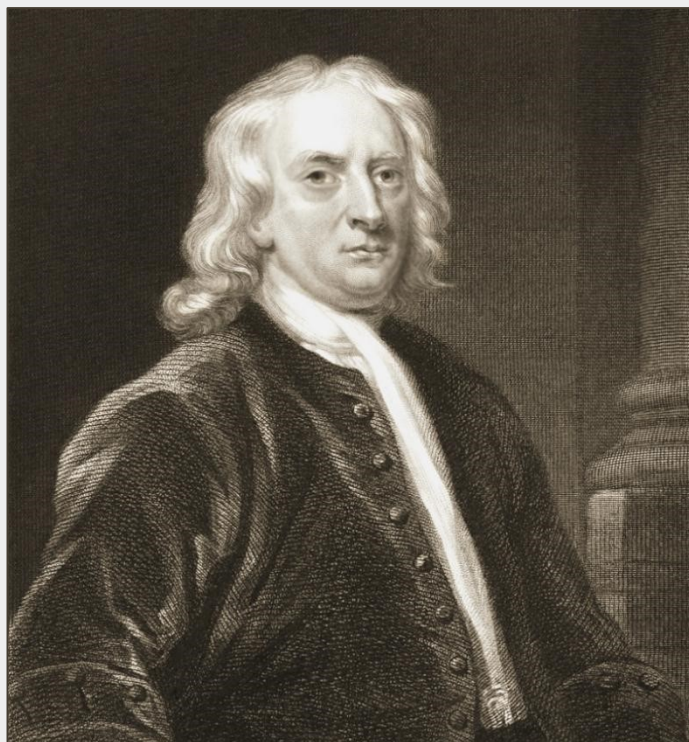
**吕兆楠：**现在 AlphaGo 已经证明了它比人类聪明，下棋下过你，假如那个时候到来，是人类最大的威胁，我认为人类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逃，逃到外星球去，他也不让你逃，逃到半路打死你了。第二个，我们毁灭掉，到那个时候能不能用人类的思维再去解释这个现象，我认为像牛顿一样，他说人类没有办法解释了，我只有相信上帝存在。那个时候假如按你的本行来说，上帝就开始讲话了，你不行，亚当是我制作出来的，你要消灭他我不同意，人类是没有办法战胜你，上帝要战胜你，将这个人拉到另外一个星球去，因为你不怕热的，你也不怕冷的，你到那里去，地球还是人类的生活圈，这种可能吗？

**何光沪：**那真是变成纯粹宗教问题了、信仰问题了、哲学问题了。

**吕兆楠：**我是这么认为，这么多有名的科学家或者我们现在还存在的或者死掉的，到最后都要相信神的存在，在我们群里也是这样，有人大讲特讲最后相信耶稣，《圣经》里边的东西都解释完了，什

么东西在《圣经》里面都可以找到，但机器人没有找到。因为你是研究宗教的权威，我提这么一个荒唐的问题。

**何光沪：**不荒唐。我也不敢说是权威，但事实上牛顿不光是说解释不了才说找上帝，他恰好是正为人解释得了，爱因斯坦有一个说法，人的理性能够理解这个自然，证明自然是按照理性的原则构成的，所以这个构成自然的一定就是反过来证明这个问题。



**艾萨克·牛顿爵士** [ Sir Isaac Newton 1643.1.4—1727.3.31 ]

物理学家、数学家，万有引力定律的提出者、经典力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在中国牛顿被刻意塑造成因投身于宗教怠惰了科学研究、至晚年无科学成就；

这种误导让不少人以为牛顿早年众多的科学发现是在所谓唯物主义“无神论”世界观指导下做出的、

而其晚年的宗教信仰阻碍了科学创造；

然而事实上牛顿在从事科学研究之前就已是虔诚的基督徒，且从未停止过对《圣经》的研究

因为牛顿的小故事是说，他把他自己造一套太阳系的模型，太阳的中间，那时候只有六大行星，六大行星的运行、自转、公转、相互之间的吸引力，距离成反比、质量成正比，这套东西非常严谨的做了模型放在桌子上请来很多朋友们，朋友就说，特别好，特别精巧，把力学规律、数学规律、几何规律都表达出来了，这个太好了，谁做的？是牛顿做的，但牛顿故意说不是我做的，没有人做。朋友开玩笑说，这个不可能吧，这么精巧的东西怎么可能没人做呢，他就反问他朋友们一个问题，说你们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有人做，那个天空上的东西一样精巧，这个是按那个做的，你们怎么不相信那个是一个智慧造成的呢，所以不光是说解释不了这个上面的，他认为这是最大的证据所在，证明这个存在。而且他用了终身很大的精力，不是说到最后才去研究这些，而是从开头就在研究《圣经》。现在英国有一个学术课题，叫做牛顿研究小组，也是一个课题组，这个课题组在他未发表的著作里面发现了牛顿在这方

面上百万字的研究。

**盛洪：**牛顿晚年主要精力就是用来研究《圣经》的，我们的教科书把这部分删掉了。

**吕兆楠：**教科书删掉了，你说牛顿这样的人在我们现代生活中能不能产生第二。

**何光沪：**我上篇文章提到，这样类推的话，是人类过于狂妄，因为《圣经》里面讲到巴别之塔，人类联合建造的通天塔想直通天堂，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阻止了，这计划就完蛋了，不能合作。所以从那个故事推理意思就是说，人过于狂妄，人本身要受惩罚，想把自己看成上帝这个意思。

**蒋豪：**现在很多医生也是上网查。

**陈威威：**现在很多微创手术是借助人工智能完成的。

**何光沪：**所以这次同工业革命有一个不同，我们要注意到，那时代替人的体力劳动，现在是代替脑力劳动，那个时代虽然我们好玩，我同意你讲的一点，我们的生活不一定不好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去玩球，而不是去扛石头，但是我们在扛石头能力方面不如原始人。

**蒋豪：**但是现在健身房有很多模拟的。



**何光沪：**所以很多长跑运动员是在非洲、肯尼亚的最优秀，这是有原因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不一定不好玩，我们虽然跑步不如人家，但是我们别的方面，比如体操，我们远远胜过，他们拿不了冠军，都有两面性。包括这本书《人工智能革命——超级智能时代的人类命运》，提到乐观的理由有 5 条、悲观理由有 8 条，而且乐观的 5 条理由全部可以被否定掉，

所以我的想法是，只要有万一的可能性、可怕的结果，可能都要努力的去避免。

请教你一个问题，你提到克隆生物工程的问题、基因工程的问题，现在有多少国家禁止克隆人、已经有立法的？我的印象有一些，不知道有多少？

**宁越：**我们没有禁止吧，我们什么都可以做，没有说不可以做的。

**王焱：**前些时候有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任小平），把猴子的头换了，下一步准备换人的，没人

说你这个违背伦理、法律什么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引起人的那种贬值吧，比如说你以前很多熟练的工作或职业。

**何光沪：**已经开始取代了。



## AI 发展与仁政

**盛洪：**讲到人工智能替代工作，我前些日子去日本玩去，自驾，我就有点体会，我就发现日本的高速公路收费的人，按照日本的这样一种技术水平应该早就被替代了，但是没有被替代，就是说大多数人都是大叔级的人，这些人可能年轻时就干这个工作，现在有人工智能了，但是日本的传统就是保证他们有工作。

**何光沪：**是一种仁慈的政治造成的。

**盛洪：**这个传统他可以缓解很多由于技术变革带来的冲击，就是他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他替代水平还不如中国，中国很多地方是替代的。

**何光沪：**他们买东西不用卡。

**盛洪：**你进入那个高速时候很多都要人工，但是他有 ETC，系统当然都一样的，都替代，但是没有

ETC 那就是人工的。

**何光沪：**他们不用手机付款，是因为他们要保护隐私，他们认为手机付款没有隐私了。

**盛洪：**他们不担心这个问题。到日本去人们可以多带现金，有很多地方根本连信用卡都不收的，这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你以为在那里用信用卡、网络支付应该更好，其实不是这样的。还有一个人类制度，人类制度是能够缓解那种技术冲击的，因为过去就讲过日本的企业，在经济萧条的时候不裁员，就是分享制嘛，保证社会本身的稳定性，不是完全纯粹的那种市场竞争规则。当然也不能说这不是市场，因为这也是一种应对的市场机制，就是危机来了到底是裁员还是减工资，这是两种选择的。我就不裁员了，我就减工资，让大家都有饭吃，这未必是一个坏事。中国因为反而没传统了，基本上是无神论的唯技术主义，就变成这种样子。在日本从这个角度来讲比较仁慈，这个说明一个问题，面对技术革命到来的冲击，还是有一种人类制度能够缓解它。

**何光沪：**你说道德里面也是需要加强，不至于给我们带来那种失衡。

**盛洪：**还有一个话题，刚才讲那个失业问题。我觉得按照萨伊定律，生产自动产生需求，这句话意思是说，我生产的东西能卖出去，比如我是生产鞋的，我的鞋全卖出去，我一天挣 1 千块，这 1 千块就是需求。当然要假设产品一定能卖出去，才能生产自动产生需求。

张五常在这个基础上又发明更微观的理论，他是说人的供给是他的需求曲线的一个镜像，他倒过来说你需求多少你生产多少，说得更微观。你为什么生产？你有需求，所以这俩曲线实际上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换了个个。这讲的逻辑很简单，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所有的需求全产生人的动力，所有的生产也是这样的。所以假如有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征不征税我觉得不是重要的，你可以把机器人当成机器设备，因为机器设备其实它耗费你的资本的投入，资本投入可以获得回报，你也可以对资本征税，这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不是对人征税。这个社会的需求主体一定是这些真人，不是机器人。这些真人，他们的逻辑就按张五常的逻辑来了，我是要有需求的，我是要有多少钱买什么东西，这个时候就是萨伊定律，我生产多少、需求多少，就是平衡的。你金钱多了仍然没有关系。你可以储蓄，储蓄变成投资，仍是需求。机器人除了用电以外没有别的需求，张五常这个公式无法适用，机器人不是因为有需求所以去生产，没有这个。所以那个机器人只是人的工具，变成一个共同构成的生产，就跟现在机器一样的，不存在另外的人，多少都没有关系。

**宁越：**那个里边的机器人是资本。

**盛洪：**对，就是资本，把它看成资本就够了，你可以为资本征税，你也可以为资本去耗费你的成本，社会的供求平衡还是由人决定的，按照张五常的说法，你想买东西那你生产，不能你想买东西供给都不供给，整个社会都完蛋了，强调的这个问题不存在了。

**宁越：**古典经济学不存在失业，市场是出清的，资源用起来。

**何光沪：**有些小观点，展开可以写文章的。

## AI 时代 人类情感关系的道德伦理

**陈威威：**我特别想听大家谈的还有，人工智能时代一旦改变了今天的这个价值观的话，婚姻不存在了，人类现存的最基本的很多东西可能都被解构了，不需要婚姻了，比如现在婚姻两个人要合作成一个家庭，有共同的孩子，但将来人工智能时代如果想要个孩子，就去找一个最佳的精神就可以得到最优质的孩子，就可以满足做母亲的快乐了，但家庭没有了。

**何光沪：**而且现在机器人还有性生活方面可以用一个好像真人肉体一样的异性伴侣可以提供的。

**陈威威：**而且少了很多两个人相处的麻烦。

**何光沪：**日本好像已经比较接近这个东西了。

**宁越：**全息嘛，这种性伴侣。

**何光沪：**机器人做爱就是这样的，还可以说一些温柔的语言，还可以安慰你，以后的还可以知道你的心理。那个问题我还是想知道，克隆那个问题，有多少地方禁止这个实验？

**蒋豪：**不知道。但是刚刚王老师提到那个事件，中国换猴脑那件事，在西方社会有反应，很多西方人抗议这个研究。因为西方的神学背景、基督教背景，他们在伦理方面反对人工合成动物这种研究，是抵制这种行为的。



## 人类进入 AI 时代如何平衡其他物种的生态

**陈威威：**如果乐观的往好处去想，很有可能将来人工智能成就的，可能不是这个世界各物种一起同步发展，而是赤裸裸的满足人类所有的欲望，而要把其他的物种作为贡品，比如好几年前就有了手机虚拟养电子宠物的，而不是真正的生命，但社会上大量的流浪狗被警察抓住不管是不是疯狗全部活活打死，反正抓你的狗就要给你杀掉。其实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已经看到一个苗子了。

**何光沪：**其他物种为代价，其他物种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来满足人类的需求。刚刚说的，他只要电，不需要消耗什么东西，他做什么身体需要一些。

**王焱：**现在那种电子器件模仿人的意识，用一些电子器件连接起来产生人的意识，以前说你得是一个有机的东西，但这一下有点贬值了。

**盛洪：**没有身体，实际上是有利有弊的、对一般大众来讲没有身体是不行的，但别忘了那些精英们经常是忘我的，包括很多成圣成贤的人，就是没有“我”的，或者说有这个肉身反而是累赘了。很多人是达到精英水平的，因为我有这个身体或者需求，所以成为我的累赘。所以没有身体也许是从精英角度来讲是个好事。就是说你没有身体了，反而更超越。所以这又是很好玩的东西，可能在某些人工智能将来发展到精英层次，可能反而比有身体的人类更超越。人类怎么说都需要休息，人工智能就不需要休息了。

**蒋豪：**下面请盛老师做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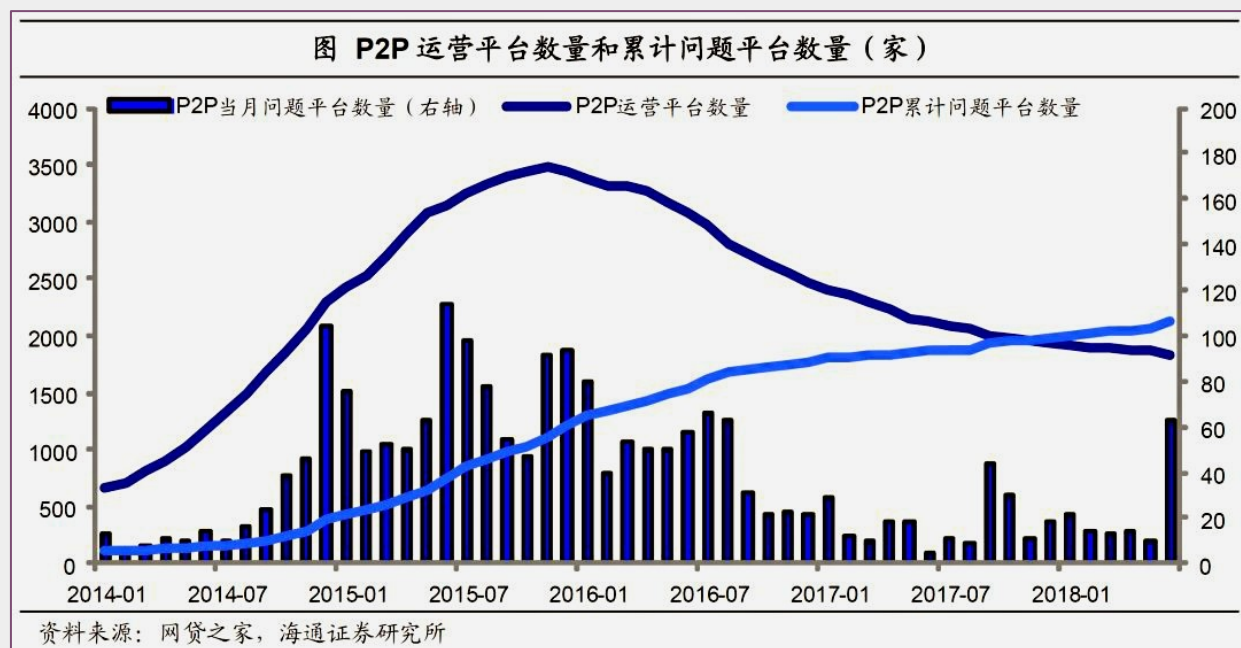
**盛洪：**首先我们这个题目非常好，还是受光沪的启发，使我们能够讨论这个问题，确实尤其在中国这个平台，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一个无神论文化，毫无顾虑，还有唯科学主义的倾向，认为所有问题都能通过科学技术解决，这可能是有问题的。但看到技术是中性的，可能会带来一些失衡、断裂或者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所以大家都从各个方面，包括从宗教、社会学、政治学，宁越从经济学、奥派的角度，还有蒋豪。各个角度，大家侧重不一样，恰好形成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最后我们把它整理出来，回头看到，可能互相补充，显得更为饱满、丰富，我是很受教，我也希望将来我们整理出来，组成一组比较好的文章，在我们这个社会提出这样的讨论。 ■

[【返回目录】](#)

## 蒋豪：P2P 接连爆雷，监管为何缺位？

[蒋豪 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法律及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本文为 2018 年 8 月 6 日中评周刊-与 FT 中文网同步首发]

由于近期中国监管部门对互联网金融风险进行专项整治，引发了一批 P2P 平台爆雷。2018 年 6 月至今，超过一百家 P2P 平台爆雷，有些是百亿级的平台，其中甚至有国有资本背景者。成千上万的投资人卷入其中，很多人或将面临“血本无归”的结局。事实上，这也是近几年中国网络贷款平台的新常态。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局面？对 P2P 贷款平台的监管是否缺位？

虽然奥派经济学家米塞斯也说过，人人都是企业家这样的话。这是从每个人都为自己负责，每个人都经营自己的角度而言，他要为“自己”这个企业创造最大的价值。但是，就社会一般意义的“企业家”这个概念来说，这部分人是社会的精英，并非人人可以胜任。当然大家都有权利尝试，但是有冒险精神并且最终也成功的人，人数并不是很多。赚取平均利润的人我们一般不称之为企业家，只有那些赚取超额利润并且能够保持较长时间的人，我们才称之为企业家，类似于我们把常胜将军才称之为“军事家”。

金融的本质是克服资金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从而为双方创造价值。相比企业家，我们所称的金融家更是精英中的精英，“企业家中的企业家”。这是由于企业家可以只专注于一个行业甚至一家企业，而金融家则要投资于不止一家企业，对各个行业的了解要比一般的企业家多一些。绝大多数在金融行业就职的人只是雇员，即使专业投资机构的很多人也很难称得上是金融家。金融家

应该是经手数额较大，业绩优良、至少比较稳定的金融業者。

因此，一般投資者要有正確的心態。我們不可能像金融家那樣高的投資效率或者說勝算率。投資者對經濟風險要有正確態度。投資肯定有風險，即使是金融家也不能萬無一失。市場經濟就是以部分人的預期錯誤為代價，保持競爭和活力的。

經過 40 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不少老百姓手裡有些資本，都想做點投資，不再滿足於以往銀行存款，甚至不滿足於銀行發行的理財產品。中國由於制度體制等原因，金融壟斷、金融壓抑嚴重，“金融民主”比較欠缺。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尤其是近几年移動互聯網的飛速發展，給投資者和貸款人提供了便捷的撮合平台。金融自由化和普惠金融得以發展。



在金融壓抑的背景之下，中國的互聯網金融飛速發展，當然是泥沙俱下，從某個角度也可以說是畸形發展。可以說是中國的國情體制造成了這種情況。這使得投資人在遭受正常經濟狀況下的經濟風險之外，還要承擔體制機制不到位產生的監管漏洞風險。發達國家沒有這種情況，是因為它們沒有這麼嚴重的金融壓抑，平時的金融生態就比較健康，有良好的慣例和監管。

對中國來說，目前不僅在互聯網金融，其實在整個金融業態，信用制度的缺失和薄弱都是根本問題。當然由於普惠金融的出現，互聯網金融、P2P 沖在前面，很多普通大眾深陷其中，這個問題比較突出罷了。因此，解決這一問題不僅是加強金融監管的問題，應該全方位地改善和提高金融生態環境，包括 P2P 平台的自我風險管控和要求。

P2P 平台應有一定的審查責任。不排除有以 P2P 平台從事新型傳銷騙局或者其他騙貸的人。對此，平台要有一定審查責任，對貸款人的資格條件、信息的真實性、融資項目的真實性、合法性進行必要審核；即至少在一些工商註冊、納稅證明、社保基金繳納情況等方面進行形式審查，以保證貸款人情況的真實性。金融監管部門應對平台是否進行審查進行抽查。

平台要重視貸款擔保，包括保證、抵押、擔保等形式。對債權類投資而言，最重要就是資產質量，

贷款要有抵押。抵押足值到位，借款风险把控就会更加到位。因此优质的资产端，无论是对平台的风控质量、还是对用户的资金安全，都是十分重要的。当然，资金雄厚的平台自己可以承担一定担保责任，以吸引资金和客户，减少风险。

要完善中国的破产制度。P2P 实际上只是一个平台，从市场经济角度，它们的责任是有限的。如果放在美国，在平台没有担保责任的情况下，也许很多平台负责人就没有必要，也不会跑路。投资者到期收不回投资，可以申请贷款人破产。破产实际上可以分为破产清算和破产重组。在贷款人只是资金周转不畅、企业营销仍比较正常的情况下，没有必要破产清算，投资者可以和贷款人达成新的协议，或者根据情况引入第三方投资人，原投资者得到约定收益后退出。

应完善公司治理制度，惩罚那些恶意欠款人。利用“刺破公司的面纱”，将那些利用破产制度逃避债务的老赖加以追究。刺破的前提是贷款人实际控制公司、财产混同、个人消费与公司财务不清等情况。

政府对于那些真正的害群之马不应该手软，否则会出现趋劣竞争，就像以前的毒奶粉事件，以及前一段的假疫苗事件。为什么趋劣竞争？因为政府真正的监管没有到位。在当下中国，这需要体制机制的一个逐渐转变过程。

在更广义的角度上，“服务就是监管”，尤其是对中国来说，真正的政府角色是非常缺位的，服务就没跟上。



西方虽然也有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但是因为它们的立法资源比较丰富，不会造成太大问题。为什么它们的立法资源丰富？因为它们的立法是由下而上的，社区、行业都有很多的自我规范，一旦遇到某个问题，它们至少会遵循一种惯例。中国的立法体制是自上而下的，出了事之后，大家都等着上面先立一个法，国务院再出一个法规，部门再出一个规章，跟西方程序是反着的。

现在在这种形势下，互联网金融本身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服务业，它也是新经济的一个亮点和增长点，因为互联网金融本身是对传统金融的一个突破，打破金融压抑、实现金融自由。整个传统金融原

来是维护垄断的，现在要倒逼政府破除垄断。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要有“扶”的一面，不能一味打压。开放性的行业自治是一种自发秩序，对于行业的发展很必要，但是，中国很多自治协会都没有实现真正的自治。

有人提出利用区块链技术解决监管的问题，但是似乎区块链也不能真正解决监管问题。区块链改善或改进了市场，但并未改变市场的本质。金融解决跨时空的交换问题，而价值的判断是主观的，区块链解决不了其中存在的信用问题，或者说不可能完全解决。

在此次 P2P 平台集中爆雷中，有的平台积极推出了具有创造性和合理性的自救措施。比如 7 月 18 日，网贷平台爱投资针对逾期项目提出了“债转股”等方案。

一是发起针对爱投资平台借款企业的股权投资基金及并购投资基金，对其中优质的中小企业进行债转股扶持，降低其负债率，增强其流动性和经营能力，以便尽快恢复到良性发展的道路上来。这相当于对某些借款企业进行重组，化解了金融“血栓”。

二是发起针对不同第三方保障机构的债转股有限合伙基金，给保障机构时间和空间处理待处置资产变现过程中的流动性问题。这相当于给第三方保障机构提供了流动性保障，从而保证了平台债务的到期支付。

三是对不同意债转股，坚持逐步回收债权的出借人，爱投资债权转让市场将保持交易顺畅，同时联合债权人代表及行业协会发起成立债权人委员会，共同协商债权处置方案。这实际上也相当于一个破产重组程序，有利于原来出借人债权的实现。

四是针对爱投资平台新发布的完全点对点对接的业务和优质小额项目，将提高新项目的信息披露程度，强化贷前、贷中和贷后全程信息充分披露及管控。这种措施同样类似一种债务重组程序，有利于原来出借人债权的实现。

该公司表示通过上述多种方案配合落地执行，用不超过 36 个月的时间帮助出借人完成项目回款。这些自救措施完全符合合同法和破产法的精神，合情合理，值得监管部门推介和其他平台借鉴。

从 P2P 平台的情况可以看出，在当前的中国金融生态环境下，对于中国的普通投资者而言，能够做到风险控制，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时间偏好和资金能力做好投资，确属不易。 🍷

[【返回目录】](#)

## 张林：如何量化中国互联网管制的冲击？

[张林 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本文首发于 2018 年 8 月 1 日纽约时报中文网]

微信公众号是中国最大的自媒体平台，它的言论尺度可以说是中国言论开放的边界。最近几个月，微信却先后关闭了新开通的公众号平台的评论功能以及留言分享功能。腾讯公司作为供给者不会主动阉割自己热销的产品，这显然又是主管部门的新要求。

对新增微信平台来说，由于只能发表不能评论的微信推文，也就使其几乎丧失了社交媒体的社交功能。最近微信自媒体对国内疫苗与#MeToo 等丑闻的揭露显示出了互联网的力量，而新增的微信公号则很难重现这样的自媒体时刻。先控制住增量，再进一步整顿现有微信平台，或许是当下主管部门的管制策略。虽然这个限制举措进行得波澜不惊，却意味着中国本已经逼仄的网络言论空间又后退了一步。

可是，互联网管制的最大受害者可能正是管制者本身。互联网搜索的技术算法决定了一个热点事件的自我强化：百度上屏蔽掉的言论，会在谷歌上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发酵。久而久之，国内媒体上的中国和国外媒体上的中国将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甚至是分裂对立的国家形象。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社会总在刻意丑化中国，殊不知本国的互联网管制却是问题源头之一，国内对所谓负面新闻的封锁屏蔽，使得境外媒体成为唯一的消息出口。仅这一点就足够值得反思，防火墙内的中国，真的因为互联网管制变得更安全了吗？

所谓“围观就是力量”，说的是网络技术不仅赋予了更多的人以更多信息，更提供了交流信息碰撞思想的平台。对于管理者来说，可以通过这些公开的信息了解人们的想法，获知人们的真实诉求，并通过回应这些诉求达成合意的公共治理。古往今来的治理失败往往出自信息的不通达，以至于管制者本身遭受蒙蔽。

同时，政府对于言论和信息的严格管控，会使得许多人只能接受片面信息而变得极端，尤其是当发现官方宣传与现实情况不符时，会产生强烈的抵触和反抗。以上道理在互联网时代依然适用，甚至更加适用，过度管制也许只能带来相反的结果——人们会以更多的敌意和恶意来评价管制者本身。

2018 年以来，中国国内关于朝美、朝韩关系改善的评论便显示出了官方“洗脑”管制的恶果。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媒体纷纷表达了对朝鲜和平弃核、发展经济的盼望。对于那些未能接触更多自由信息，因而浸染在官方中朝友谊宣传中的人群来说，这却是一件不可接受的坏事，他们集结在“铁血论坛”和“乌有之乡”等网络论坛上猛烈批评中国政府的无所作为，而政府对相关消息的删除和屏蔽使之更加怒不可遏。

比如今年以来，乌有之乡微信公众号“乌有之乡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鼓吹朝美对抗、揭露中国资本家丑陋、暗示官方走向修正主义的文章，因而在 6 月份遭到官方的永久性封号。在其封号后的声

明中,认为官方本应和自己一起“站在人民立场替本阶级说话”,并“在国家民族立场”上支持中兴、声援中国的贸易战,结果官方的表现令人失望,他们宣称自己会继续利用其他手段“为本阶级鼓与呼”。

因此,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左派群体——他们是最相信官方言论、对社会主义最深信不疑的人,却在改革开放之后失去了执政的基础地位,甚至成为官方最警惕的群体。邓小平先生南巡时曾说,“既要防右,又要防左,但主要防止左”,而所谓的“左向”思潮,正是官方长期言论管制和信息过滤的结果。十八大以来,官方认为不能用改革开放的成就否定计划经济的历史,整个社会在强力管制下向左而行,社会上的仇富、民粹和民族情绪弥漫,这样做是危险的。根据我任职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对民营企业家的调查样本,超过40%的中小民营企业家明确表示出移民意愿。

而最近,面对中美贸易战所引发的社会争论,则更加证明了中国社会的撕裂程度之深。那些长期以来被“厉害了,我的国”占据了头脑的人,认为中方的妥协意愿就是丧权辱国,而金融等领域的扩大开放不过是以市场换和平——堪比清政府的以土地换和平。而微信上广为流传的声音虽然对官方近年来的自大之举充满非议和嘲弄,却多半对开放市场予以支持。也很可能正因为微信空间里的“妄议中央”,主管部门收紧了对于微信平台的管控,而进一步的网络言论管控,或许又将更多的人推向了対立面。

早在2013年,天则经济研究所组织了一项社会调查,其中涵盖了信息渠道不同对人们看法的影响,由于问题的敏感性而未能发表。虽然调查的时间已经相去较远,但是数据分析所揭示的结果却和当下发生的事情不谋而合——接受更多自由信息的人更加温和,对政府的评价更积极;而那些获取管制后的信息的人群,以及信息量获得较少的人群,则对政府的评价更有敌意。

这项社会调查涵盖了全国30个省会城市的6259份有效样本,为了保证回答的有效性,允许样本匿名回答。在当年,微博还是最流行的自媒体渠道,正是针对微博的管制性阉割,使得后来的微信快速崛起。总之,样本中有些人主要通过主流新闻网站和报纸获取信息——他们中有许多是体制内职工和老年人,标记为“管制信息人群”;有些人主要通过微博、博客获取信息——他们多数较为年轻并在私营部门任职,标记为“自由信息人群”;有些人从聊天过程中获取信息——他们大多生活在郊区或者农村,标记为“信息缺乏人群”。

以此为基准,可以对比三类人群对政府评价的不同。举例而言,在上述调查问卷中有一个问题描述如下:“假设中央拨专款给本地政府,要求本地方政府给每人发放100元补贴,您认为最后能有多少元送到本地老百姓手中?”结果是,自由信息获取人群的回答均值为43.69元,管制信息获取人群的回答均值为40.94元,而信息缺乏、道听途说人群的回答均值为39.69元。如果考虑到显著性问题,自由信息获取人群的估计均值是显著高于其余两类人群的(95%置信区间)。

这个例子表明,获得更多自由信息的人群,对政府廉洁程度的感知更乐观一点;那些依靠官方新闻或者道听途说来交流信息的人群,反而对政府廉洁程度的判断更消极一点。再考虑到样本人群的平均收入分布,可以发现自由信息人群收入水平较高,一方面显示了信息获取和收入机会之间的正向关

系，另一方面说明作为经济上的相对受益者，他们更容易对体制善意宽容；而信息缺乏人群的收入水平是最低的，这表明社会底层人群获得信息的渠道和内容最为有限，可他们对政府行为的猜测上却是最有“敌意”的。可以说，最严厉的互联网信息封锁，可能带来的是底层公众对政府的最大敌意猜测。



中国正在利用互联网用户规模全球最大的地位帮助其在境外实现自己的目标

从绝对值上来说，猜测地方政府是贪污掉了 60% 还是 55%，看上去区别并不是太大，但是，政府部门会贪污掉一半以上财政支出却成为人们心中的共识。而且，相比其他群体，接受管制信息的人群并没有认为政府更廉洁，这说明无孔不入的互联网管制从产出上看是无效的。这里还尚未计算每年分配给网络舆情部门数以亿计的资金成本投入，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人自危的警察社会氛围。

问卷里还包含另外 10 个类似的问题。比如，当问到调查对象是否同意“碰到不合理的政策结果，我会采取抗议行动（比如示威、上访）”时，分别有 13% 的信息缺失人群、12% 的管制信息人群选择了同意，而只有 9% 的自由信息人群选择了同意。以上至少说明，自由信息人群并没有更强烈的对抗倾向，虽然他们在网络上对政府的批评言辞激烈，但在实际中可能更愿意用打官司等和平的手段处理与政府之间的纠纷。

又比如，当问到调查对象是否同意“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制定的政策是可信的”时，自由信息人群选择同意或者非常同意的比例最高（64%），其次是信息缺失人群（62%），最后是管制信息人群（59%）。再比如，当问到调查对象是否同意“现在的政府体制最适合中国国情”时，自由信息人群选择同意或非常同意的比例为 67%，管制信息人群选择同意或非常同意的比例为 66%，而信息缺失人群的该比例则降为 60%。

这 11 个问题的回答显示出了同一性，即，政府对信息的严厉管控并没有改善人们对政府的看法。当然，上述论证并不完全具有学术上的稳定性，6000 多份有效样本也并不能保证样本的无偏性。而且，文中所称的对政府的“善意”和“敌意”也并非完全能被信息渠道的不同所解释。比如，能够自由获得信息的人群可能是社会的相对受益者（主要在收入方面），所以相对敌意较少。

但上述不足，并不妨碍这里的主要结论：获得更多自由信息的人显得相对更温和、对社会公正性和稳定性更有信心；而另外一方面，获取管制信息较多，甚至管制者本身，反而显得对政府政策并不信任；获取管制信息人员、信息获取较少人员对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的评价更消极。

给互联网筑上高墙，也并不能减少异见人士、维权律师和人权斗士的前赴后继，他们正是为了打破这高墙而产生。即便他们反对体制，但他们至少坚守了和平的底线。反之，对于自由言论的过度限制、对于政权一味地美化宣传反而会激起暴力的反弹，除非政府的所作所为能与他们所宣传的那样严丝合缝，否则，信息高压管制只能制造更多持刀报复的杨佳们，以及与政府对峙的维权老兵们。

这些分析所透露的信息让人不由地反问，互联网高压管制的意义何在？信息过滤和信息屏蔽让人更加恶意地忖度管制者，大大增加了管制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可能。于是，互联网高压监管或许就带来了这种扭曲，一些能够善意理解体制的人却面临着最多的管制成本。在中国的语境下，那些能够善意理解体制的人就是在市场中形成的中产阶级，他们应当是当下中国社会里最无可奈何的一批人，他们希望社会稳定，却又屡被管制所伤害打压。

如今官方特别注重中国的扶贫事业，争取在建党 100 周年（2021 年）时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愿，证明中央政府在乎自身的声名，这并不是坏事。可是从近年来民间活动空间和言论空间逐步退却的事实来看，恐怕官方正在积攒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嘲弄，互联网管制的逐渐加码起源与此。但是，即使互联网管制强大到能够屏蔽掉所有负面消息——那是不可能的，也只会增加人们内心的质疑，本文的例子只不过在重复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对于互联网空间的强力管制正在伤害中国的移动互联网经济，它是中国经济自 2012 年以来的唯一亮点。

可惜，微信自审的敏感词名单正在不断变长，维权律师正在不断地被取消执业资格，媒体从业人员正在纷纷跳槽，官方支持的监控技术正在突飞猛进，看上去互联网领域的言论高压并没有任何放松的可能，互联网管制还将继续伤害中国的公众，继续伤害中国的管制者本身。 ■

[【返回目录】](#)

## 盛洪：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市场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为 2018 年 8 月 10 日中评周刊-与 FT 中文网同步首发]

美国人对《中国制造 2025》很有意见，让中国朝野有点始料不及。其实，这个文件是无数个类似文件中的一个。这种“类似文件”是指，看起来很漂亮，但基本上不会落实；有些文件一旦落实，不仅没有好处，还会带来浪费甚至灾难。中国民间早已习惯了，没把它当回事。只有寻租集团可能会摩拳擦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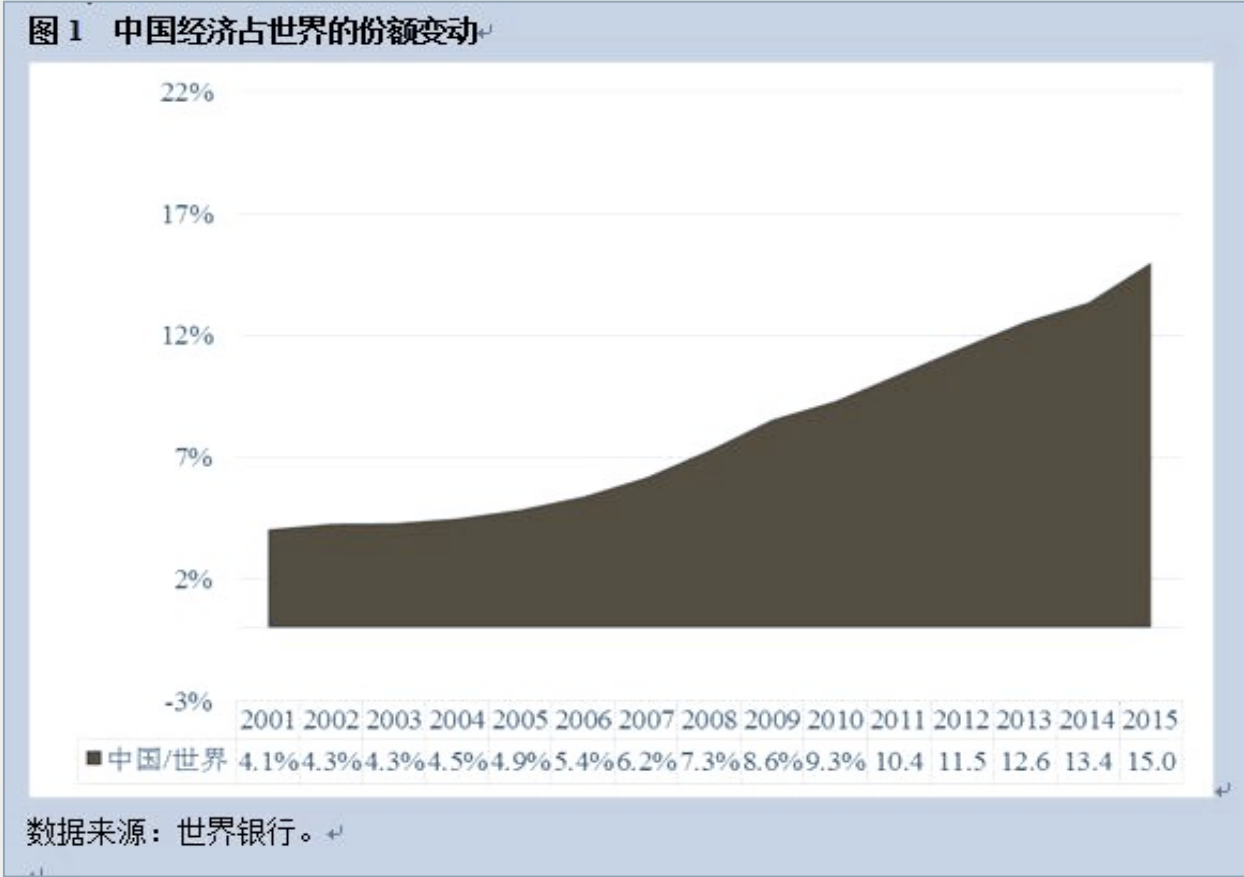
但美国人把它当回事。为什么？这其实是在夸奖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着实让人害怕。自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就一直保持顺差，而且越战越勇。美国人一向自视甚高，他们实际上并不害怕贸易赤字，因为这样就可以将美元卖出，但他们不愿意面对一年 2000 多亿美元（他们说 3000 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似乎在说，他们在市场中竞争不过中国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就会找原因。一个原因就是竞争的“不公平”。

中国做得确实有点“不公平”。因为有高额政府补贴，如中国有科研基金制度。2016 年，中国财政的科技经费支出高达 6564 亿元。不过这个制度貌似在推进中国的科技创新，其实没起什么作用。主要的作用，就是以一个小高尚的、动听的名义分钱。早就有人说，科研基金就是唐僧肉。真正推动中国科技创新的制度是知识产权制度。具体的分析我将会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阐述。现在谈另一方面的事情，这就是，给了美国人以口实，说中国的竞争不公平。美国人也许并不知道，中国的科研基金制度并不会在知识产权制度上锦上添花，却可能釜底抽薪。因为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创新转移到了寻租游戏；并挤走了大量本该进入科技市场的资金。也许他们知道却故意不说。这不怪他们。在市场经济规则下，“政府补贴”就是政治不正确。

回头再讲“中国制造”。这个词有什么问题吗？倒退到 2001 年，这个词没有错。那时中国只是一个“小国”。为什么是小国？因为当时中国的 GDP 占全球的比重只有 4.1%。当年中国加入 WTO，只是一个世界市场舞台上的一个新生。一个小国，一个新生，努力在世界市场的博弈中有更好表现，甚至采取了一些违规动作，无可厚非。因为按发展经济学，后进国家因为没有现代工业，缺少竞争力，如果仅按公平的市场规则，它们就永远是非工业国。所以在贸易中，领先国家会对后进国家放宽某些条件，如允许后者有不对称的关税水平。在 WTO 的框架内，也明确规定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某种优惠和照顾。如一定程度上允许发展中国家政府对产业的补贴，允许这些国家对进口的数量限制，发达国家单方面提供优惠关税和降低壁垒等等。

但在 15 年后，中国已经不是小国了，而是世界舞台上的庞然大物。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二，占世界经济的份额达到 15%。在这时，“中国制造 2025”所蕴含的意味，就显得有些问题。因为这还是小国

思维，不遗余力地要加速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进一步挤占世界市场。在这时，已经承受中国巨大竞争力的外国企业应该会感到焦虑。即使是美国这样一个世界最大经济体、技术领先国家，也感到了不安。这已经说明了问题。美国人公然对“中国制造 2025”提出质疑，要求中国取消这一政策，似乎是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其实不然。中国的今天，如果再适用 WTO 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似乎说不过去，所以那些在 21 世纪初还能容忍的政府补贴在今天就变得不合时宜。因而，“中国制造 2025”提出的对制造业技术升级进行政府补贴的做法，就违反了公平的贸易原则。



那么，“大国思维”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领先的大国就应该开始考虑其它国家的利益，就像一个大哥要照顾小兄弟一样。大国就不能只想着挤占更大份额的市场，而是要想着与其它国家分享市场。回顾一下近代以来的大国，我们发现，它们并不是在贸易上雄霸全球，而经常有着持续的贸易逆差。如英国。我记得看过一个英国在十八九世纪的贸易差额表，令我惊讶的是，与一般的预期相反，在英帝国最鼎盛时期，有着持续的贸易逆差。这张表我现在一时找不到了，不过有确凿的数字表明，自 1924 年至 1936 年英国的贸易是赤字（见下表）。而美国，自从二十世纪 70 年代以后，就是持续的贸易逆差（见下图）。这是为什么呢？当一个国家走到世界巅峰位置，它就是一个最大的市场。它一方面享有着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同时也要对这个世界有所回报。这个回报就是要带动整个世界。这就包括将自己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同其它国家分享。

表 1 英国的贸易逆差 (1924~1936)

年 份	輸入值(已除去再輸出額)				英 貨 輸 出			
	報關額 千英鎊	按一九三〇年市價計算 千英鎊	指 數 (1930=100)		報關額 千英鎊	按一九三〇年市價計算 千英鎊	指 數 (1930=100)	
			平均 價值	數量			平均 價值	數量
1924	1,137,469	869,930	130.8	90.9	800,967	662,263	120.9	116.0
1930	957,140	957,140	100.0	100.0	570,755	570,755	100.0	100.0
1931	797,385	984,390	81.0	102.8	390,622	436,763	89.4	76.5
1932	650,649	864,499	75.3	90.3	365,024	438,363	83.3	76.8
1933	625,935	877,653	71.3	91.7	367,909	449,464	81.9	78.7
1934	680,171	927,696	73.3	96.9	395,986	481,690	82.2	84.4
1935	700,738	940,613	74.5	98.3	425,834	518,383	82.1	90.8
1936	786,982	1,005,506	78.3	105.1	440,605	531,266	82.9	3.1

数据来源: F.Behan,《保护贸易下之英国》,正中书局,1947,227页。

图 1 美国的贸易差额 (1950~2017) 单位: 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united-states/balance-of-trade>

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 是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第一大市场。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最多。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以上, 再增加收入时, 人们不会再增加基本消费品的消费数量, 如不会一天吃十顿饭, 一家买十个电视机, 而会购买更贵重的奢侈品。因此, 在大多数商品市场中, 人数的因素比人均收入的因素更重要。即使是汽车这种贵重的商品, 由于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被很多人看作是必需品, 因而中国的汽车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除了房地产市场, 武器市场, 和其它一些奢侈品市场外, 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如果中国守着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不放, 还要挤占更多别国的市场, 就

显然不是大国思维。

中国是人数上的最大国家，还意味着中国在贸易上的优势。这我称之为“巨国效应”。这个概念是从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推导而来的。克鲁格曼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假设之一，规模报酬不变，改成了规模报酬递增，就发生了一场理论革命。在这个新假设下，国家的规模就会产生作用。当其它条件相同时，一个较大国家会在自由贸易下优于一个较小国家。这是因为，较大的国家就有较大的市场，较大的市场就会培育较大的企业规模，较大的产业规模，和整个国家的较大的产业间配套规模。这都会使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再向外国出口，就具有竞争优势。而中国不仅是“较大”，而且是“最大”，克鲁格曼的理论也就会推向极致。

具体看数字。2016年中国的汽车、大家电、计算机和手机的产量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其中手机的产量几乎是天文数字，达18亿部之多（见下表）。这样的巨额产量，会给中国带来巨国效应，在国际贸易中带来额外的优势。所以尽管中国产业在技术和管理上还与领先国家有差距，但在国家规模上得到了弥补，甚至还有多余的优势。下表还显示，这些产品的巨大产量，首先归功于巨大的国内市场，以此为基础，向国外输出。而出口量一般最多不到产量的60%。

	汽车	家用电冰箱	房间空气调节器	家用洗衣机	家用吸尘器	移动通信手持机	微型计算机设备	彩色电视机
产量	2812	8482	14342	7621	8766	184846	29009	15770
出口	581	4433	4273	2249		107739		8064

数据来源：产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出口数据，汽车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来源于云中鹤“销量大技术含量低！2016年中国家电出口统计数据出炉”，（不包括港澳台地区），载《驱动中国》，<http://www.qudong.com/article/392705.shtml>；手机数据根据小伊琳“2016年10月中国手机出口市场分析”数据估计，载《电子工程网》，2016年12月2日，<http://ee.ofweek.com/2016-12/ART-8420-2800-30074310.html>。

因而，中国的巨国优势不仅保证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长期优势，而且也为中国走向“中国市场”提供了条件，即中国可以对某些较小、较弱国家实行单边自由贸易。即无论该国是否实行自由贸易，中国都将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对其它国家，至少可以实行对等的零关税。对于中国的国际战略而言，这一分享市场的做法对其它国家和中国来讲，其带来的好处都可能远超“一带一路”战略，因为后者有着很高的投资风险，也由于借重于国有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还会将国企的弊端放大到世界范围，最终可能会产生债务违约甚至政治危机，反过来殃及国内。而分享市场的做法才真正帮助了更大范围的国家，它们的企业要在适度优惠的贸易政策下，在中国市场进行真正的竞争，只有得到中国消费者的青睐，才能分享这个市场，这同时又是有效率的。

最后，不要以为，中国若让各国分享市场，就是“吃亏了”。实际上，大国有“大国模式”。仔细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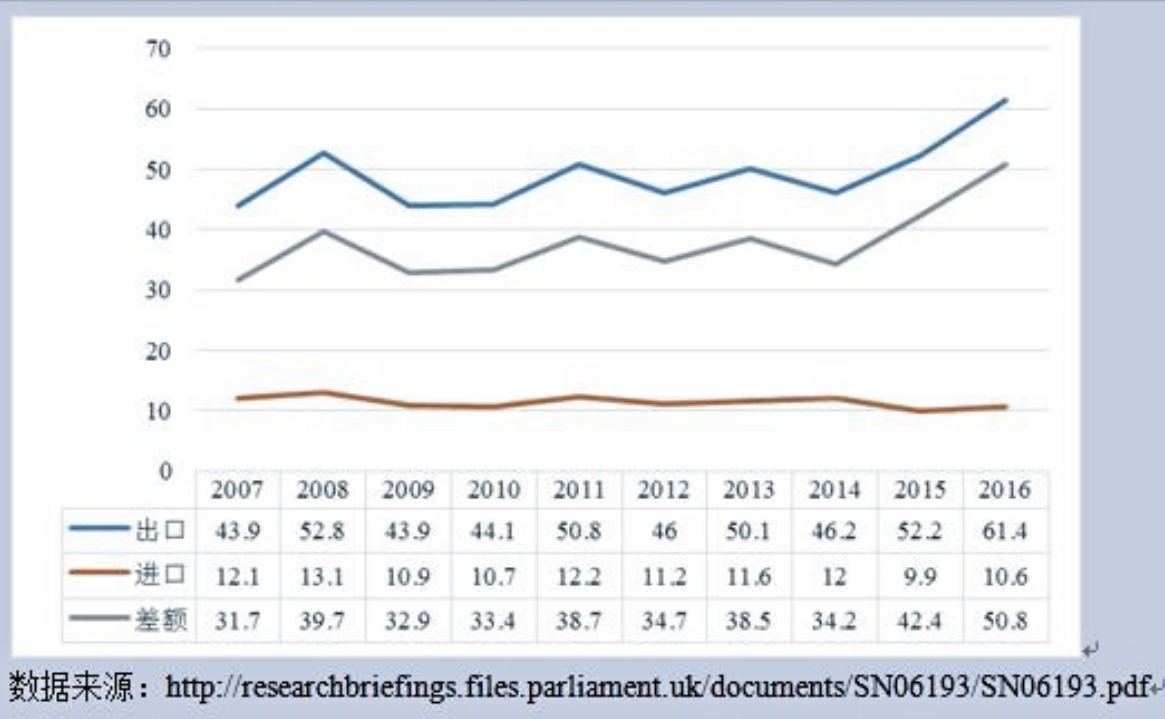
下，称霸时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它们吃亏了吗？实际上，在老大分享商品市场的时候，它在金融市场上大赚其钱。我们可以把美国的贸易逆差看成是一种金融服务，即美国用贸易逆差的方式发行美元，而美元只是美国政府的一种金融创制，它的物理材料只是纸，甚至连纸都不是，只是电子符号，成本极低，但由于得到了企业或个人的信任，同时可以用来进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支付，计价，以及储备，起着一种有效货币的作用，所以就被认为有独立的价值。货币是一种最好的商品。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某种特定的商品，但是没有人不想要货币。因此，算上美元，美国并没有贸易逆差，却有更高的利润率。

人们早就注意到铸币税的概念。古代的货币多是金属货币。货币价值就是用金属的重量来衡量。如著名的汉代五铢钱，铢是重量单位，大概 24 铢为一两，所以不能缺斤少两；但是古代的王朝发现，可以改变金属成色。用较贱的金属替代较贵的金属形成的铜合金的成本就会低一些。于是发行货币就有赚头了。在现在这个纸币时代，铸币税就更多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就等于向全世界发行货币，其赚得的铸币税，如果按广义成本 20% 计，美国 2017 年的 5660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相当于赚了 4528 亿美元的铸币税。所以像美国这种大国模式的、有逆差的贸易，实际上更赚钱的贸易。

即使是失去帝国实力和尊荣的英国，也因金融业的发达而能接受持续贸易逆差的模式。自二十世纪 90 年代开始，英国就经历了持续的商品贸易逆差；2000 年以后，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见图 2）。但英国的金融服务却保持着高额的贸易顺差，到 2016 年竟达 510 亿英镑。见图 3。金融服务等英国服务业的贸易顺差，再加上金融账户的资本流入，使得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图3 英国的金融服务贸易（2007~2016） 单位：十亿英镑



对于中国来说，要从小国思维转向大国思维，要从小国模式转向大国模式。不能再狭隘地认为只有更多地挤占世界的商品市场才是在创造财富。更重要的是，这也许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当一个国家崛起，从小国变成大国，就不得不选择这样的转型。一个企业似乎可以赢者通吃，因为这只是一个或一类产品或服务的事情；一个国家不可以赢者通吃，如果可以，别的国家就没了吃了。因此，通过产品的出口走向世界巅峰的国家，如果持续地奉行小国模式，到头来就要处于与其它国家对立的境地，因而转向金融服务或其它服务就是一个可行的方向。一方面可以避免与其它国家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从而以产品市场作为与其它国家分享的蛋糕；一方面又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和难以进入的产业，保证该国的长期利益。当然，也许还有其它更高明的模式，但就目前我们已知的模式，这种大国模式是可行的。

但要实现这一转型也不容易。关键在于，金融体系是更为制度依赖型、契约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的产业。那些在生产产品时还不太显现的问题，在金融领域中会变得相当严重。如果不保护产权，金融产品的安全受到威胁，将会产生严重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会迅速蔓延，从而压低金融产品的价格以致使其亏损；如果有政府补贴，金融产品的价格扭曲将会带来更大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市场的不平衡；如果有垄断，如中国现在的垄断利差比竞争性价格高出 25~66%，则会吓跑外国需求者；如果有频繁的对市场的干预，就没有自发形成的公正的交易秩序和价格体系。如果金融服务要向世界市场输出，就不能由一国政府完全操控，而要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因而，所谓转型，实际上是制度演进；所谓中国市场，实际上需要有更为遵循市场规则的中国制度。

然而，中国能否建立起一个让人信赖的金融体系，中国能否让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还是个疑问。

上述的几个问题，产权缺乏保护，政府补贴，垄断，以及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都是中国当下存在的严重且不易克服的问题，甚至是现在所谓的“中国模式”的固有部分。粗略说来，尽管中共中央于 2016 年就发布了平等保护产权的文件，但在实际上产权越来越不安全了，小到街头早点摊，大到阿里巴巴，其产权都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不太重要的行政目标，如整顿市容，或安全排查，一分钟就可以将经营了十几年的早点摊关掉。最近的北京市政府的所谓“减量发展”，又一次威胁着在北京市郊谋生的人们的产权。

人们在支付宝购买的金融产品，不知为何就突然没有了。其实这种经营权也是一种产权，是互联网时代发展出的虚拟世界的产权，对这种产权的不尊重，等同于对实体产权的不尊重。如网络信息服务的经营权，这包括在网络上运营的商业性账号、甚至包括一个微博或微信公众号，其关注人群或粉丝群都是可以营利的客户基础；这个服务账号所能获得信息的自由流动性，潜在客户达到这一商业性账号的可通连性，等等，都是其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中国这类产权还没有被视为产权，行政部门可以不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任意关闭一个商业性经营账号，一个直播账号，一个网站，一个微博，一个微信公号，而不在乎这侵害了人的财产权利，在网络上经营的权利。相对于其它领域，金融领域的交易主要是数字交易，它更借重于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它对信息的实时性要以秒计，如果不能尊重和保护网络上的虚拟产权，阻碍互联网的信息自由流动，就根本不可能在金融服务领域中战胜竞争者，而吸引大量外国客户。

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似乎已被国企利益集团看成是自己的固有利益，取消补贴将会遭到它们顽强的对抗。垄断权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交易秩序更是令人担忧。最近的假疫苗事件揭示，一方面用政府权力保护假疫苗的销售，另一方面又将真疫苗说成是假疫苗加以打击，直接破坏交易秩序的就是政府行政部门。在这时，人们很难相信，交易秩序是公正的。2015 年的股灾，也是一次史上罕见的金融操纵事件。一些投机大鳄利用银行资金撬动价格，证券价格在几天内可以在 8% 的幅度上上下下震荡，却没有得到任何惩罚。这不是有公正规则的市场。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现在越来越缺乏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约束。缺少这一条件，对上述各项要点的强调都没有意义。如此看来，中国离大国模式还很遥远。

所以，所谓大国模式就不仅是让大家分享本国市场，而且是自己首先要建立起真正的保护产权和维护公正秩序的制度规则来，而这又离不开建立起约束权力的宪政结构。这样才能持续本国的发展，也才能吸引外国人对本国金融资产的需求。否则，就无法实现从小国模式到大国模式的转型。而如果不能完成这个转型，中国将会在小国模式的竞争中越来越与其它国家产生紧张和对立，也越来越会受到其它国家的反弹，最终在小国模式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中国正处在这个应该转型的过程中。只是中国自己的行政部门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延续着小国思维。美国对“中国制造 2025”的指责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有益警醒。这是一件好事情，促使中国想一想，应该转型了。如果拒绝这一提醒，中国也许永远不可能从小国模式转型为大国模式，她走向巅峰的道路将会中断。

当然，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英国和美国都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完成这一转型。尤其是英国，在早期还是一个依赖于暴力优势的帝国。中国不可能一下子变成一个贸易逆差国，但可以逐渐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中期目标是实现贸易平衡。这实际上等于在向世界逐步开放自己的市场。这也不意味着中国不再在制造业领域中努力，而只是不要进行大额政府补贴，而民间企业还会世界商品市场上显示力量。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真正的制度变革，有效地约束行政权力，使中国逐渐加强对产权的有效保护，包括对虚拟产权的保护，取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打破垄断，并迫使政府行政部门不去干预市场。只有这样，中国的金融服务才能真正强大起来，让其它国家的企业和公民相信中国市场的安全和公正，相信人民币，中国才能最终完成向大国模式的转型。

有趣的是，美国指责“中国制造”，又要求减少贸易逆差，也就等于要减少美元的出口，这似乎像是一个退出大国模式的序幕。也许许多年以后，人们还会惊叹特朗普总统的超凡的直觉。他“逼着”中国走向大国模式，又自觉地让美国退出大国模式。如果中国逐渐完成向大国模式的转型，而美国又在逐渐退出、至少是部分退出大国模式，不就完成了一个美国与中国的平稳交接。历史会是这样的吗？

[【返回目录】](#)

## 金雁：每个民族都要正视自己的痼疾

[金雁 东欧问题专家，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秦川雁塔，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当代俄罗斯怎样落实“政治转型”是我们很关注的题目。两年前我们在俄考察了他们如何处理前体制的政治迫害及其遗留问题，并与彼得堡、莫斯科和彼尔姆的俄国学者以及 NGO 组织成员进行了座谈，根据记录整理并结合我对类似相关书籍的阅读综合如下。

俄国学者指出：斯大林时期遭受政治迫害的人虽然大都得到了平反，但是进行迫害的主体和执行者没有人承担责任，国家没有颁布任何法律文件来认定国家恐怖是一种犯罪，在这方面历届政府都保持缄默，新俄罗斯也没有进行过任何一起针对斯大林时期恐怖参与者的审判。

民间谚语说，“冤有头，债有主”，但是在俄罗斯没有人对过去的政治迫害负责，一句“体制原因造成的”便使那些作恶的个人卸下了责任。曾经在“一个不为什么就可以抓人的时代”里遭受不白之冤的人们，最后又被轻描淡写地以“莫须有”的说法给了“说法”，以至于至今俄罗斯那些冤屈的幽灵无处归依。

古拉格中超过 1500 万人获刑，超过 150 万人不明原因死亡，他们绝大部分可以说是一种“主体性缺位的冤情”。前体制的后继者为了保护自身免受追究，有意采取了一种“回避”和“遗忘”的态度——让大大小小的斯大林们随着倒塌的金字塔一起消亡岂不是更保险吗？



位于今日哈萨克斯坦境内的阿克莫拉劳动营纪念碑

其实，死者的悲剧同样也是活者的悲剧，犯了罪行的社会必须要有反思。每个民族都应当清

算自己身上积淀下来的弱点和痼疾，这项工作只能自己去做，任何旁人都无法代替。体制的恶是人类社会集体性的默契合谋，这里面既有领袖个人的因素也有民众的社会土壤。

就像娜杰日达·雅可夫列夫娜所说的一样，“我们大家全都有罪，我们曾在 20-30 年代野蛮的意识形态面前缴械投降”。人类若是只会在自身之外寻找“替罪羊”，是不可能长记性地避免同样的错误，历史的轮回仍然会再一次嘲弄自以为走出了劫难的民族，我们“反复折腾和不容异见的习性将永无尽头”。人们都知道，“天使不会摔倒，魔鬼会摔得永远躺在那里，人会摔交，也会站起来”，这是人类进步的法则。制度并不能成为个人免责的借口。



劳改营犯人制作的微型圣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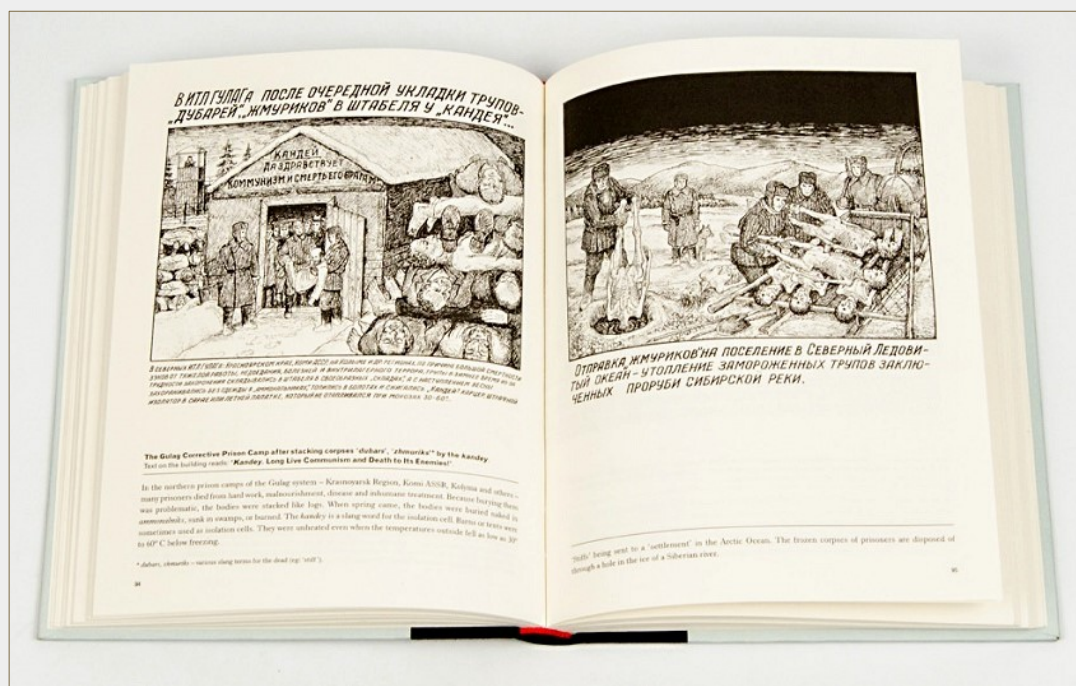
在这方面毫无疑问俄罗斯做得比德国和东欧一些国家差，德国能够坦然面对自己两段不光彩的历史——纳粹统治和东德专制。在德国，媒体公开请纳粹后代谈如何寻找过去，如何面对父辈罪恶的历史。德国政府从 1990 年 10 月正式启动调查前国家领导人的犯罪行为，追究斯塔西犯罪的法律责任，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不在历史上留下空白点而彰显法律的庄严。

2013 年 10 月俄总理梅德韦杰夫在网上发表了题为“对民族悲剧的纪念如同对胜利的纪念一样神圣”的视频博客，但是就整个俄国而言，回避这些“不光彩”的过去仍是大多数人的想法。“记忆协会”的主管叶林卡娅对我们说，“受害人的状态在电视里无人提及，在官方的历史中是没有恐怖记忆的”。

官方不记忆是一个方面，老百姓由于获取信息的手段有限记忆不了是另一个方面。在这种刻意选择回避的氛围下，年轻人对苏联过去的历史知之甚少。如果没有民间记忆，只有官方撰写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将被淹没，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方法，把真实的历史呈现出来，在这方面德国人的经验可以作为参考。

德国从 80 年代末就开始组织独立于官方话语之外的中学生作文比赛。我们从 2008 年也展开了这项活动，老师让孩子们去调研，去访谈，了解自己的祖辈父辈的生活状况，让孩子们进行自我命题写作，谈自己的感受。

从这些 13-17 岁的中学生寄来的调研文章，从孩子们的标题就能够感觉到他们的视角，感受到这一代人的思维模式。起初怎样让孩子们描写和记录历史？主题怎么定？我们之间也有争论。最后大家达成共识，那就是书写和记录与官样文章不同的历史。



### 丹齐克·巴尔丹夫 (Danzig Baldaev) 的《来自古拉格的图画》

Drawings from the Gulag, Murray & Sorrell 2010 年出版,

是一部以绘画与文字记述的关于前苏联古拉格劳改营虐囚和酷刑的令人震惊的政治图书，作者曾是前苏联古拉格劳改营看守，他根据亲眼目睹和了解的第一手资料创作而成，因而极具惊人的真实性

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意识形态教育，都是政权史，都是大人物史观，“小人物”的“分子”与历史对立，民众贱如蝼蚁。而如今我们倡导民间需要有自己的记忆，我们应该让每一个人在时代中留下痕迹，倡导“芸芸众生”每个个体留下回忆录。

这是个艰巨的任务，现在人们不太提过去的事情，关于个人的历史是接触不到的。我们的这项活动不是权力的历史，而是“人”的历史。于是以此命名“个人的历史”。现在通过民间的工作，通过孩子们的努力，我们要把人的历史这一课补上，“说出真相”是我们要走的第一步。

我们俄“纪念协会”是一个民间组织，从 1984 年开始就有一些活动。最初是在政治松动以后，一些遭受政治迫害者的家属想要知道自己的亲人在古拉格中经历了什么？围绕这个主题有超过百万人的自发游行活动，是当时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于是 1988 年在罗津斯基先生的倡导下，正式成立“纪念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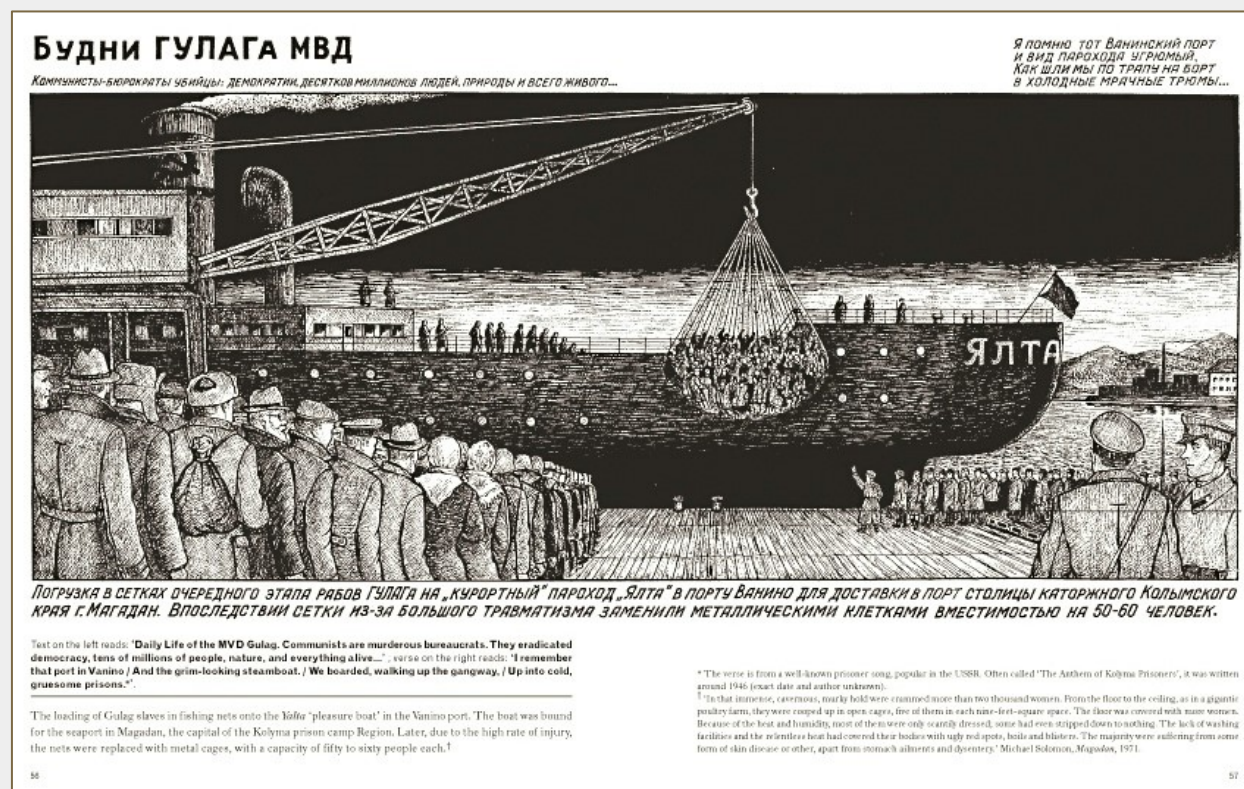
纪念协会的工作：首先，调查了解俄国的人权状况，收集和记录下受害者的经历。第二，针对目前破坏人权的情况提供法律援助。其次，为受害者提供必要的帮助。这是该协会从成立以来坚持至今的目的，现在纪念协会在俄国有 65 个分支机构，是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民间组织。

我们就是要把“罪恶”说成是“罪恶”，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大声地公开地说成是“罪恶”。让人们了解我国长时间大规模的罪行，记住每一个牺牲者。我们就是要把罪恶公布于世，让人们自由的利用这些文件，建立纪念碑，反映在教科书里，通过影视作品再现历史等等。这个活动进行过程中我们更加深了信念，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制度有绝对的关联性。

我们这样做不单单是保留一种记忆，而是体现公民的权利，人把握是命运的权利。我们公开的宣布“个人就是权利的主体”。我们把历史真相与人权结合在一起来审视苏联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应当理直气壮的大声质问，这种针对广大民众的恐怖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我们要告诉人们，大规模的践踏人权就是昨天的历史，不正视它就有可能重蹈覆辙。

### 应不应该“翻历史旧账”？

与我们座谈的俄国朋友说，俄罗斯就像是患上了一种痛苦健忘症，讳疾忌医的不愿直面过去，靠忘却来治愈伤痕。这种状况与官方的态度不无原因，直接参与了政治迫害的父辈们选择集体沉默，导致了历史叙事的“模糊性”和“断裂性”。正是那些从前主张把手铐拧紧的人物，如今大都不愿意去直面真相。



前苏联古拉格劳改营囚犯们被装进渔网送往另一处监狱，选自丹齐克·巴尔丹夫所著《来自古拉格的图画》，2010年出版

他们说，不要去翻旧帐了，“几十年的岁月在流逝，往日的伤痕和溃疡已经无影无踪了，何必再去翻那些往年旧账呢？”他们假假惺惺地以体谅受害者的口吻说，“要翻旧帐——这是哪个傻瓜想出来

的，这是往我们的伤口上撒盐嘛！”他们希望在人们的脑海里，俄罗斯只有今天没有过去，好像这个国家是凭空长出来似的。

而真正遭受过政治迫害的人却不是这样想的。索尔仁尼琴就说，被枪毙了的人不会讲，失散了的人们不会讲，那些执行者，即使他们还活着，也会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对于社会上弥漫着“不应该翻老账”说法，索翁表态道：“我们应该公开谴责宣扬一部分人可以惩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

“对邪恶默不做声，把它赶到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百倍的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惩治恶人，这不单单是在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等于是从下一代脚下挖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他们之所以长成‘漠不关心的一代’，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什么‘介于工作薄弱’，现在年轻人脑子里装的是，干坏事在世上永远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一定带来好处”。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作者娜杰日达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她说，我们一定要发声，“最起码受害者应该哀嚎出来，因为沉默是真正的反人类罪，可是为什么我们竟然丧失了哀嚎的能力？”她将这种普遍的失语称之为“瞌睡症”和“心理瘟疫”。

娜杰日达特别指出，我们关注黑暗面不是为了掀起复仇的浪潮，而是为了使俄罗斯不再迈入同一条河流。至于俄罗斯社会不关心过去的罪行的原因，有一种说法是“因为那么多人参与其中，苏维埃制度使其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同流合污受到牵连，搞不好会引起连锁反应。

对过去的历史不承认、不忏悔、不讨论、不反省，使得过往仍像石头一样压在后苏东国家身上，秘密档案的内容四下流传，不断扰乱着当代政治生活。失忆也给文明国家的形成和法制国家的建设造成严重后果，说白了，只要前体制的丑行没有受到惩罚，人们就不可能看到善良战胜邪恶。古拉格意识仍然部分残存在俄罗斯权贵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看法中”。在新俄罗斯随时有可能重演过去可怕的那一幕。

### **对“人”的认识仍需努力**

造成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对前体制的不同态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俄罗斯人对“大国光荣”的怀念和向往，把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念相互缠绕在一起，使人们无法理出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暴政。在苏联时期人民很容易被“历史进步”这些宏大叙事的大词汇忽悠和裹挟进去。

历史“必然性以一种似乎不可抵御的力量强迫人接受它带来的后果”。“历史决定论的布道使我们丧失了意志和自我判断能力”，对历史规律的“圣物崇拜”使人们自愿把自己依附于一个强大主体，而让渡掉个性的成长和责任意识。

由于统治者把外部世界凶险化，与内部敌人作斗争便成为被灌输的光荣职责。在这种社会建构里是需要有人来扮演魔鬼的角色的。人们从小学开始所受的教育就是，“国家利益是超越一切的”，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分不开。当时一个经典的诗句是“假如列宁的事业消亡了，我们有什么理由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当苏联与西方世界隔离的“墙”打破以后，人们发现列宁的事业消亡了，所有

人都理所当然的有理由活着。当代俄罗斯政治环境虽然与苏联有所不同，但是大部分民众并没有从依赖国家的目标模式中走出来。



《来自古拉格的图画》中记述的古拉格伐木场，当局纵容刑事犯们按住政治犯的四肢、锯子锯进政治犯的腰间。

令人发指的酷刑还有将钉子钉进政治犯的嘴里、将犯人溺死在便溺坑里等数十种酷刑



这些令人深感痛苦和惊悚画面，作者所见证和还原的历史真相远比文字直接而且强烈，

残忍的酷刑、屠杀、虐待、奸污等情节占据了大部分篇幅，

前苏联古拉格集中营看守**丹齐克·巴尔丹夫** 著

在苏联的政治概念里，把具体个人融化到整体的大目标中去，被看做是一件值的荣耀事情。“个人利益服从总体利益”是那个年代耳熟能详的口号。“个人”作为一种社会属性是不受欢迎的，因此一切蓝图描绘中都缺乏人性和人本位。

在那种体制下，所有的人都是螺丝钉、齿轮，都是机械部件，随时更换、弃之不用或者回炉再造都是再正常不过了，滚滚的历史车轮碾碎的、抛弃的都只不过是“分母”而已。如同波兰作家米沃什所说的：“当一个政权把人划分成‘顺民’和‘罪犯’两类时，就会对懦夫和狗腿子大加奖赏”，“他们需要制造出恐怖”，“恐怖是社会的黏合剂”，而“害怕独立的‘自由人’”。

利用人来建设但目的并不是为了人，人从来就不被视为“目标主体”，于是为崇高目标的杀人就不是犯罪。在《被开垦的处女地》小说里，作者借小说人物马卡尔·绍古尔诺夫的口吻说：纵然“在我面前站着成千上万的长辈、儿童和妇女，如果对我来说，这是革命的需要，我就会用机关枪把他们全部杀光”。在作者看来，为整体剪灭掉个体只要目标正确，个人就不承担法律责任，“历史必然性”不但可以为这种行为开脱，而且还大肆鼓励宣传。对此俄国至今仍缺乏深刻的反省而为鉴戒。 🚫

[【返回目录】](#)

## 张维迎：后发国家的怨恨情结

[张维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本文为作者读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之后写的读书笔记，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原理]



张维迎教授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西方世界一直有一种怨恨情结。理解这一点，对理解当今的中美关系非常重要。

当然，怨恨情结，并非中国人特有。在世界近代史上，许多后起民族都对先发达起来的国家产生过怨恨。

### 现实的不平等滋生怨恨

怨恨，简单地说，就是一种羡慕、嫉妒、恨交织的情绪。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告诉我们，怨恨（resentment）这个术语是由尼采创造的，其后又由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界定和发展，它是指由受压抑的、无法消弭的嫉妒和憎恶（生存的嫉妒）所导致的一种心理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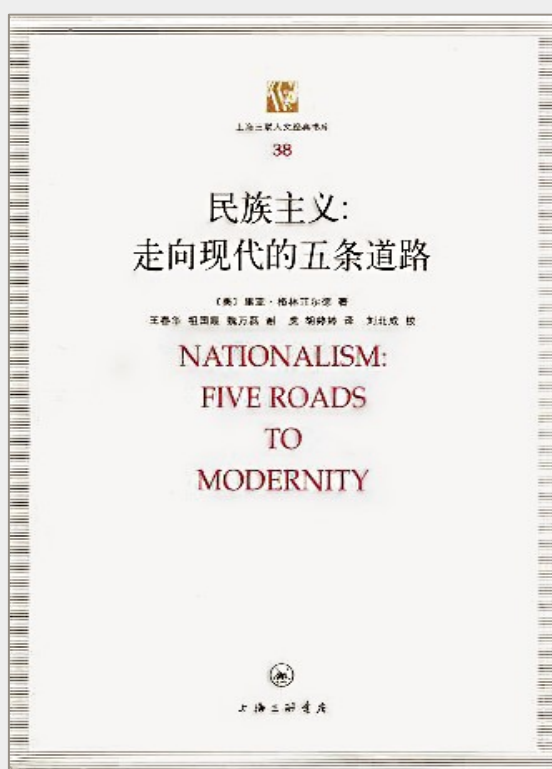
格林菲尔德指出，在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落后国家总归要向发达国家学习，模仿后者。在模仿过程中，一方面，即使在模仿者看来，被模仿者也更为优越（否则，就没有必要模仿了），另一方面，相互接触本身往往也凸显出模仿者的低劣，所以通常的反应是怨恨。

具体讲，怨恨的产生，有两个社会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模仿者相信他们与被模仿者在根本上是可比的，在理论上是平等的，因而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即赶超的可能）。第二个条件是，模仿者又感到二

者之间实际上并不平等。不管群体成员的个体性情与心理构造如何，这两个条件的存在产生了一种群体怨恨倾向。

格林菲尔德进一步指出，怨恨产生了一种抗拒外来价值的创造性冲动，最终可能导致“价值重估”，即价值标准的转变。原来至高无上的价值被贬低，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外在的，甚至是原先标准中带有负面色彩的观念。出于自尊心，一个拥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社会不可能对外来的价值观念来者不拒、全盘照收。

怨恨常常导致本土传统中与外来的价值观念相对立的元素被挑选出来并被刻意栽培，或者与外来的价值观念抗衡，或者在形式上将其打扮成与外来的价值观念类似但本土“早已有之”的东西，以求得心理平衡。怨恨滋生出民族特殊主义的骄傲和仇外，给新生的民族情绪提供感情养分。



《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

[美] 格林菲尔德 著 王春华 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0 年 1 月出版

### 民族国家是个现代概念

在人类历史上，族裔认同古而有之，但“民族国家”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中，国家是统治者的私产，人们普遍认同的是王室或宗教，而非民族国家。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个君王同时兼任两个甚至多个王国的国王，就如同现在一个人可能同时兼任几个公司的董事长一样，并不罕见。

根据格林菲尔德的研究，英格兰或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它到 17 世纪初已经形成，它的核心理念是公民、自由和人民主权。这样的民族观念后来被 18 世纪晚期至 19 世纪中叶形成的美利坚合众国所继承。

相对于英格兰,其他国家如法兰西、俄罗斯、德意志的民族国家认同形成较晚:法兰西在 18 世纪,俄罗斯在 18 世纪下半叶,德意志在 18 世纪晚期至 19 世纪初。相对于英国和美国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俄罗斯和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可以称为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法国介于二者之间。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群体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英格兰、法兰西和俄罗斯的关键群体是贵族,德意志的关键群体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精英的观念变成了大众民族概念的基因。

### 法国人的怨恨情结

法兰西是第一个有怨恨情结的民族。在 18 世纪开始之前的数个世纪,法国一直是欧洲的霸主,甚至是天主教的保护者。但在路易十四死后,法国已明显丧失了它在欧洲的优势地位。英格兰突然崛起,跃居中心地位。当 18 世纪上半叶民族观念从英格兰引进的时候,法国人发现,英格兰人在各方面都超越自己,尽管法国仍然有值得自豪的杰出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法国的民族爱国主义的表现是,强烈要求恢复被英格兰夺走的优势地位,重新赢得法国的荣耀。

有两种办法可能确保法国的卓越地位和荣耀:进行自由主义的改革,将法国变成一个类似英格兰的国家;或者削弱英格兰这个对手的力量。像伏尔泰和孟德斯鸠这样的启蒙思想家拥护第一种办法,他们心中没有怨恨,认为法国有能力实行从英格兰学到的东西,并因此可以轻松地超越它的榜样兼竞争者。

但这项任务比预期的更加困难,花费的时间也更长,于是亲英情绪逐渐让位给仇英情绪。法国贵族知识精英们深信,法国同英格兰基本上可以相媲美,但现实中前者确实次于后者。英格兰的优越地位伤害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在他们心中滋生了对西方(英格兰)的怨恨。

在怨恨情绪的支配下,法国贵族知识精英一方面盗用英格兰人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又对这些价值观念进行重新评估。比如,对于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概念,他们给出了与在英格兰全然不同、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思。他们用“一致性”取代了平等,用“主权”和“公意”取代了自由,用“集体”取代了个人,为专制主义和平均主义铺平了道路。

对英格兰人的怨恨导致法国人对金钱、商业活动和资本主义产生了一种本能的仇视。在法国人看来,英格兰是一个贪婪的民族,一个“只对金属有感情”的国家,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不正义、贪婪、腐化、堕落,由商业利益主宰的民族,是不适合法国效仿的。

在对外关系中,怨恨使得法国人常常不是以法国变得强大为目的,而是以不惜一切代价削弱英格兰为目的。对法国人来说,英国人的坏消息就是自己的好消息。法国精英和大众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支持,部分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爱和对美国人民的好感,但更多地是出于对英国人的憎恶。美国脱离英国统治,是最让法国人解恨的事。但路易十五没有想到的是,战争导致的财政困难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导

火线，最终让自己死在断头台。

### **德国人的怨恨情结**

怨恨情结在德意志民族中造成的影响更甚。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在 18 世纪晚期出现，拿破仑战争之后，已经扎下了根。所以说，法兰西是德意志民族主义出现的最终原因。但这个时候，英国经过工业革命已称雄世界，德意志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不仅比不上英国，甚至比法国也自愧不如。这让德意志人难以释怀。

尽管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先进的”西方民族（英格兰和法兰西）学习了理性、政治自由和个人平等的启蒙思想，一些改革者甚至视法兰西为效仿的榜样，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还是受到了伤害。

到 19 世纪初，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德意志人的怨恨情结也变得越来越强烈，“西方世界”（英国和法国）成了邪恶的化身，反面榜样。“可憎的法兰西民族”被认为是德意志人“自然而传统的”敌人，是“肮脏、无耻、没有纪律的种族”；英格兰人总体上并不比法兰西人更好，他们的诸项自由没有什么价值。

按照德国历史学派创始人李斯特的说法，英国人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为整个世界生产，垄断所有的生产能力和通过政治操纵以及资本、技术和海军优势使世界处于幼稚和依附状态。”因此，德国不应该被英国人所宣传的自由化道路所蒙蔽，而必须让国家主导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样，德意志民族主义变成了国家主导的“族裔民族主义”。

随着西方日益被等同于资本主义，德国人对西方（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怨恨就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怨恨。当把目光转向自己国家内部时，德意志知识分子发现，德意志生活中同样存在着那些体现了西方价值观的东西：资产阶级、贸易与工业、城市、科学。但他们也明白，德意志如果想有朝一日超过西方，这些因素又是绝对必要的。

因此，他们不得不对所有这些东西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但代表这些非德意志价值观的犹太人就成了替罪羊。正是贪婪的犹太民族的阴谋诡计，使得德意志没有办法表现得像它本可以的那样优秀。拿破仑解放犹太人的行为进一步刺激了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憎恨，他们把犹太人和法国人放在一起，反犹便成了反法爱国行动。这就滋生了德国人的反犹主义，直到发生希特勒杀害 600 万犹太人的暴行。

不过，犹太家庭出生的卡尔·马克思还是把怨恨集中在资本主义本身，私有制成了万恶之源。怨恨情结，或许是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大陆比在英国，在落后国家比在发达国家，更有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 **俄国人的怨恨情结**

俄罗斯这个民族也是伴随着对西方的怨恨形成的。俄罗斯的西方化是彼得大帝发起和推动的。最初，俄罗斯人对西方羡慕不已，把它们当作绝对的、无可置疑的榜样，并且乐观地认为，模仿西方国家，就可以与它们处于平等地位，然后就可以超过它们。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改革也确实提升了俄罗斯

的国际地位，给俄罗斯人带来了自豪感。

但彼得大帝的改革并没有让俄罗斯与西方达到真正平等的地位，俄罗斯人被俄国和西方榜样之间的差异深深困惑，西方的优越地位让他们感到不愉快，把西方作为榜样不可避免地导致自我鄙视和低人一等的感觉，这就让他们心中的怨恨之火熊熊燃烧。

怨恨催生了文化相对主义，俄罗斯人开始寻找自己民族的特殊性，重新评估西方价值。因为俄罗斯是独特的，与西方不可比，因此西方不适合作为俄罗斯模仿的榜样，俄罗斯要走自己的、与西方不同的道路。西方变成了嘲笑的对象，赞美西方的俄罗斯人被讥讽为妄自菲薄，甚至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改革也被认为是自轻自贱，是对俄罗斯人的羞辱。

但完全拒绝西方是不可能的，因为俄罗斯并没有与西方对抗的资本，西方的认可也是俄罗斯人所期望获得的民族自尊的必要条件。既然无法超越西方，俄罗斯民族主义精英就把俄罗斯定义成与西方相反的榜样。他们仍然用西方同样的标准衡量自己，但是通过对这些标准进行重新解释，俄罗斯在各方面都比西方好得多。对应西方的每一个缺点，它有自己的优点；西方表现出来的优点，它在现实中也都有。“理性”的价值被保留下来，但变得近似于黑格尔讲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拒绝了其隐含的个体的创造性和自主性。

他们承认“自由”和“平等”是美德，但拒绝承认西方制度是其真实的体现，因为西方的自由和平等不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真正的自由是内心的自由，而非法律上的自由。西方人有自由的权利，但却生活在真正的奴役之中；俄罗斯人没有法律上的自由，但生活在真正的自由中。

俄罗斯精英们发明了“人民”，将“人民”界定为一个种族集合体，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存在于“人民”中，但只有有教养的精英才能揭示出来。精英作为“特殊之人”（先锋队），知道“人民”想要什么，而大众自己不知道，所以前者自然有权命令后者。

因此，在怨恨情结支配下形成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是种族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权威主义的。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俄罗斯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怨恨情结诱使俄国人急于证明自己的价值，一次又一次或主动或被动地发起与西方的对抗，但每次都被屈辱地打回原形。同样的戏剧至今仍然在上演。

日本也许算得上是一个少有的既模仿西方，又没有太多怨恨的非殖民地国家。这是因为，日本一直是一个模仿者，“脱亚入欧”只是换了一个老师，并不会伤害日本人的自尊心。超过它原来的老师，反倒让它感到自豪。只是到太平洋战争前，美国才成为日本人怨恨的对象，结果是导致了日本的惨败。

### **中国人的怨恨情结**

中华文明有数千年的历史，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的形成则是非常近代的事情。可以说，是西方人的坚船利炮催生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并使“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出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进入20世纪之前，中国人效忠的对象是相继统治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民众的各个皇帝和朝廷，而不是

主权国家；朝代的更换，领土的分合，是统治者的事情，与普通大众没有什么关系，就像现代商业公司领导层的更迭、业务的并拆与普通员工没有关系一样。

对普通大众而言，谁坐上皇帝的宝座，我就是谁的臣民；无论是汉人当皇帝，还是契丹人当皇帝、女真人当皇帝、蒙古人当皇帝、满族人当皇帝，对我都一样。所以，他们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中国人”的概念。

但伴随着西方人的到来，特别是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逐渐把效忠的对象由朝廷和皇帝，转向了民族和国家（但这个转变没有彻底完成）。在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成过程中，主导力量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他们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危机感，并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

但如同法国和俄国的贵族精英、德国的知识精英一样，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对西方的怨恨情结。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并自认为是世界中心的国家的人民来说，突然发现有一个比自己先进的外来文明，产生怨恨是自然的。中国的精英们对西方世界的感情是羡慕、嫉妒、恨的交织。

一方面，他们将诸如共和、民主、自由、个体权利、理性、科学等这样一些西方价值观引入中国；另一方面，他们又根据中国原有的政治文化观念对西方价值观进行选择性的吸收或摒弃。民族自尊心和怨恨情结使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西方价值观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不可能将其全盘照收。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总是试图从本土文化资源中或其他不优于自己的国家寻找它的替代品。

中国人对俄罗斯有着因为领土问题导致的怨恨，但较少因发展阶段差异导致的怨恨，这或许是中国人最后选择“走俄国人的路”的原因之一。当然，俄国人的道路看上去也更符合中国国情。俄国是落后的，走的路是独特的。如果它的路行得通，沿着这条路很快能富强起来，中国人就可以洗刷掉民族的屈辱，恢复国家的荣耀。因此，走俄国人的路对中国人的自尊心伤害小，但预期的收益大。

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对中国的现代化非常重要，它让中国人有了一个具体的奋斗目标。但中国人民族概念形成中的怨恨情结也带来了一系列后果，其中包括：

第一，中国人的民族概念至今仍然是族裔性的，而非公民性的。我们是“中国人”，是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有共同的祖先，而不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主权国家内拥有平等权利的公民。这样的民族概念给现在的国家治理带来了一些难题，因为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这样的民族观念也使得中国很难吸引外国移民，因为一个外国人不论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多少年，永远不可能被承认是中国人。

第二，主权大于人权，权力优先于权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是在国家“图强”和“救亡”中形成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是国家功利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它强调国家至上、集体至上，在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名义下对个人权利的任何侵害都具有正当性。至今，“有国才有家”、“大河有水小河满”仍然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基本观念，尽管这些说法根本不合逻辑。进一步，国家等同于政府，政府等同于政府

官员，所以官员的权力总是优先于个人的权利，法治难以形成。

第三，强调特殊性，否定普遍性。特殊主义是怨恨情结的解药。特殊主义否定了相互比较的可能性，否定了优劣之分，可以保护自己的自尊心，因而所有有怨恨情结的民族都喜欢特殊主义，中国也不例外。特殊主义也使得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接受普适性价值，不按国际规则行事。

第四，模仿技术，但拒绝模仿制度。鸦片战争之后不久，中国人就开始承认自己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需要向西方学习，因而搞起了洋务运动，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至今仍然是中国变革的主导思想。因为，只要“体”是自己的，我们就用不着自卑，正像科学家不会在工程师面前自卑一样。因此，我们总是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与西方抗衡的价值观念，认为西方的治国理念并不比我们老祖宗早就提出的治国理念好到哪里去。

第五，反资本主义，反民主和自由。中国人把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等同于西方世界，承认这些东西，就等于承认西方各方面都优于中国，让中国人太没有尊严。因此，中国既不能搞资本主义，也不能搞自由民主，何况民主和自由也不能当饭吃。中国不像德国人那样有犹太人群体可以怨恨，那就怨恨那些经商赚钱的人吧！即使中国需要市场经济，也只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有本质的区别。

第六，自力更生，万事不求人。中国必须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西方人有的我们必须有，粮食必须自给自足，一切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必须自己生产，因为西方世界是靠不住的，它们亡我之心不死，随时准备卡我们的脖子。“中兴事件”就是一个明证。

第七，“阴谋论”在中国非常有市场。中国一直是西方阴谋的受害者。中国之所以落后，不是因为我们不聪明，而是因为西方人太狡诈；不是因为我们的体制和文化不优越，而是因为西方人总是搞阴谋诡计，不让我们发达起来。外国人帮助中国，一定是另外图谋。

第八，只能表扬，不能批评。中国人对批评特别敏感，不仅中国人自己不能批评中国，外国人更不能批评中国。中国人不能批评，因为“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批评自己的国家就是“不爱国”，就是抹黑自己。外国人不能批评，因为那会伤害中国人的自尊心。批评中国的外国人一定是反华势力，奉承中国的外国人一定是友好人士。殊不知，奉承者常常是别有用心。

第九，国际关系中，只讲利害不讲是非，有时甚至连利害也不讲，只讲好恶。西方的坏消息就是中国的好消息。凡是西方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西方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如果一个西方国家与一个非西方国家发生冲突，大部分中国人希望前者输后者赢，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后者，而是因为我们痛恨前者。所以，“911”事件有中国人叫好，伊拉克战争中有不少中国人给萨达姆加油。当然，如果美国与日本发生冲突，我们会站在美国一边，因为我们怨恨日本人更甚于怨恨美国人。

第十，未富先娇，稍强即狂。怨恨情结使得中国人心中总是憋着一口气，一有机会就想出人头地，所以很容易从自卑走向傲慢，国家稍富强了一点，就表现出一种暴发户心态，到处炫耀，不再谦卑，要做到“韬光养晦”谈何容易！

鸦片战争过去已经快 180 年了。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其国际地位也大大提高。但中国人对西方的怨恨情结似乎没有因此而减少，移民海外的中国人的怨恨情结似乎更甚。

近几年“中国模式”、“新四大发明”之类的说法甚嚣尘上，不能不说是怨恨情结的体现。如果“中国模式”能推广到全世界，中国不仅可以夺回失去已久的优越地位，而且可以洗刷掉不堪回首的百年耻辱。这是何等惬意的事！

怨恨程度是国家发达水平和民族成熟程度的一个反向度量。中国人的怨恨情结消退之日，或许才是中国的真正崛起之时！ ❷

[【返回目录】](#)

## 云豹沙龙 | 2018-2019 年度众筹

### 一. “云豹沙龙”简介

中评网/中评周刊作为网络媒体平台和学术-社会的沟通桥梁,每年都会就热点问题举办四、五期小型沙龙/研讨会,邀请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热点问题展开客观理性的分析向社会公众介绍知识界的专业观点和深入交流。小型沙龙通常为期半天,主题涵盖经济、法律、文化、历史、国际事务等领域。曾举办的有代表性的沙龙诸如:

- 2011年3月,「**城市发展和公平正义**」研讨会,讨论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参会专家包括: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首经贸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刘业进等。
- 2012年3月,「**遏制部门立法 保护公平正义**」研讨会,聚焦于行政部门主导立法导致的部门本位问题。参会学者包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干帆、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田飞龙等。
- 2013年4月,「**铁路改制:问题、展望与出路**」研讨会,于铁道部改制为中国铁路总公司之际举办。参会学者包括: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荣朝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等。
- 2014年9月,「**邓小平与中国**」研讨会,于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举行。参会学者包括: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负责人李胜平、著名历史学家章立凡、《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等。
- 2015年10月,「**股市行为与市场规则**」研讨会,讨论2015年股灾成因及教训。参会专家包括: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负责人田利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等。

### 二. 众筹方案

2018-2019年度,中评网/中评周刊将延续往年“云豹沙龙”年度系列沙龙活动。为此特向社会公众发起众筹,以筹集沙龙的组织资金。

#### 1. 众筹目标: 3万元 (2018-2019年度4-5场沙龙的总经费)

#### 2. 众筹资金将用于:

参会专家交通费和劳务费  
会议场地、茶水费用

会议专业速记费、摄影摄像成本

会议资料编辑费

会务组织劳务费

### 3. 众筹回报：

#### 1) 面向社会听众：

**支持 100 元：**可获得本年度系列沙龙中任选一期完整发言稿（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400 元：**可获得当年五期沙龙的完整发言稿（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800 元：**可获得本年度五期沙龙的听众入场券（以手机短信形式通知）。

#### 2) 面向内容合作方：

**支持 8 千元（每期沙龙仅一位）：**获得一期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可共同协商拟定该期沙龙的议题；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的独家报道权；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可获得并使用该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支持 3 万元（全年仅一位）：**获得全年系列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可共同协商决定各期沙龙的选题；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各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可获得并使用各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 4. 社会听众付款方式：

银行汇款至北京中评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账号：861581962310001（招商银行双榆树支行）。  
汇款附言请注明“参与沙龙众筹”+您的姓名+您的手机号或您的电子邮箱。主办方核实款项后将通过您预留的联系方式与您联系。

### 5. 内容合作方联系方式：

内容合作方请洽陈女士商谈合作详情。

**联系方式：**[wistom113@163.com](mailto:wistom113@163.com), 13717696284。

### 6. 说明：

如因各种原因,2018-2019 年度沙龙活动不足五期,则参与众筹者的权益将自然顺延至下一年度。  
感谢您的浏览! ■■

[【返回目录】](#)

中评周刊邮件订阅方式 | 读者来信: chinareview2000@gmail.com

电话联系方式: 13717696284 15011147717

微信公众号: 云豹 ONE(ID:chinareview1)

您可以在以下地址下载往期中评周刊:

**Dropbox:**

[https://www.dropbox.com/sh/7tsrbl4y32h3zrk/AAADCfzLgHHNe0Szy7\\_NQ3m\\_a?dl=0](https://www.dropbox.com/sh/7tsrbl4y32h3zrk/AAADCfzLgHHNe0Szy7_NQ3m_a?dl=0)

**Onedrive:**

<https://1drv.ms/f/s!AtpheKM9vX8Zaay8vB8f0joiCdo>

**百度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3nGlllI-5ehNtyrl9dKw> 密码: t9ed